

時間的
記錄
茅盾

大地書屋印行

大地文庫
時間的紀錄



大地文庫刊

第一輯

| | |
|---------|----|
| 風景談 | 一 |
| 雨天雜寫之一 | 八 |
| 雨天雜寫之二 | 一四 |
| 雨天雜寫之三 | 一七 |
| 談排隊靜候之類 | 二五 |
| 聞笑有感 | 三六 |
| 談鼠 | 三三 |
| 東條的「神符」 | 三七 |
| 狼 | 四四 |
| 森林中的紳士 | 四八 |

第二輯

| | |
|-----------------------------|----|
| 一九四三年試筆····· | 五二 |
| 「七七」感言····· | 五五 |
| 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 | 六二 |
| 回憶之類····· | 六六 |
| 「文協」五週年紀念感想····· | 七〇 |
| 如何把工作做好？····· | 七三 |
| 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 | 七六 |
| 文藝節的感想····· | 七九 |
| 現在要開始檢討····· | 八二 |
| 爲詩人們打氣····· | 八五 |
| 第二輯 | |
| 序「一個人的煩惱」····· | 九 |

| | |
|------------|-----|
| 「新綠叢輯」旨趣 | 一〇三 |
| 序「沒有結局的故事」 | 一〇四 |
| 爲「親人們」 | 一〇六 |
| 關於「遙遠的愛」 | 一〇九 |
| 窒息下的呻吟 | 一一四 |

第四輯

| | |
|-----------|-----|
| 「最理想的人性」 | 一一八 |
| 永恆的紀念與景仰 | 一二五 |
| 高爾基和中國文學 | 一二四 |
| 高爾基與現實主義 | 一二九 |
| 永遠年青的韜奮先生 | 一三四 |
| 億洗星海先生 | 一三六 |
| 後記 | 一五一 |
| 後記之後記 | 一五二 |

風景談

前夜看了「塞上風雲」的預告片，便又回憶起猩猩峽外的沙漠來了。那還不能被稱為「戈壁」，那在普通地圖上，還不過是無名的小點，但是人類的肉眼已經不能望到牠的邊際，如果在中午陽光正射的時候，那單純而強烈的返光會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沒有降起的沙丘，也不見有半間泥房，四顧只是茫茫一片，那樣的平坦，連一個「坎兒井」也找不到，那樣的純然一色，就使偶爾有些駝馬的枯骨，牠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圍的蒼茫，又是那樣的寂靜，似只有熱空氣在作哄哄的火響。然而，你不能說，這裏就沒有「風景」。當地平線上出現了第一個黑點，當更多的黑點成爲線，成爲隊，而且當微風把鈴鐺的柔聲，丁當，丁當，送到你的耳鼓，而最後，當那些昂然高步的駱駝，排成整齊的方陣，安詳然而堅定地愈行愈近，當駱駝隊中領隊所掌的那一桿長方形猩紅大旗躍入你眼簾，而且大小丁當的諧和的合奏充滿了你耳管，——這時間，也許你不出聲，但是你的心裏會湧上了這樣的感想的：多麼莊嚴，多麼嫵媚呀！這裏是大自然的最單調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動，就完全改觀，難道這不是「風景」嗎？自然是偉大的

。然而人類更偉大。

於是我又回憶起另一個畫面，這就在所謂「黃土高原」，那邊的山多數是禿頂的，然而層層的梯田，將禿頂裝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黃毛的癩頭，特別是那些高桿植物頗長而整齊，等待檢閱的隊伍似的，在晚風中搖曳，別有一種惹人憐愛的姿態。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樣的藍，幾乎透明似的，月亮離山頂，似乎不過幾尺，遠看山頂的小米叢密挺立，宛如人頭上的怒髮，這時候忽然從山脊上長出兩支牛角來，隨即牛的全身也出現，着犂的人形也出現，並不多，只有三兩個，也許還跟着個小孩，他們嫻嫻而下；在藍的天，黑的山，銀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給田園詩人見了，必將讚歎為絕妙的題材。可是沒有。這幾位晚歸的種地人，還把他們那粗樸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從山頂上飄下來，直到他們沒入了山坳，依舊只有藍天明月黑魃魃的山，歌聲可是繚繞不散。

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場面。夕陽在山，乾圯的黃土正吐出牠在一天內所吸收的熱，河水湯湯急流，似乎能把淺淺河床中的鶯卵石都沖走了似的。這時候，沿河的山坳裏有一隊人，從「生產」歸來，興奮的談話中，至少有七八種不同的方音。忽然間，他們又用同一的背調，唱起雄壯的歌曲來了，他們的爽朗的笑聲，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們的手，這是慣拿調色板的

，那是昨天還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產曲」的，這是經常不離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筆如有神的，但現在，一律都被鋤鐵的木柄磨起了老繭了。他們在山坡下，被另一羣所迎住。這裏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會調朱弄粉的手兒，已經將金黃的小米飯，翠綠的油菜，準備齊全。這時候，太陽已經下山，却將牠的餘暉幻成了滿天的彩霞，河水喧嘩得更響了，跌在石上的便噴出了雪白的泡沫，人們把沾着黃土の脚伸在水裏，任他冲刷，或者擲起水來，洗一把臉。在背山面水這樣一個所在，靜穆的自然和瀾瀾着生命力的人，就織成了美妙的圖畫。

在這裏，藍天明月，禿頂的山，單調的黃土，淺瀾的水，似乎都是最恰當不過的背景，無可更換。自然是偉大的，人類是偉大的，然而充滿了崇高精神的人類的活動，乃是偉大中之尤其偉大者！

我們都會見過西裝革履帶髮旗袍高跟鞋的一對兒，在公園的角落，綠蔭下長椅上，悄悄兒說話，但是試想一想，如果在一個下雨天，你經過一邊是黃楊色的濁水一邊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漿裏，有時還不免打了一下跌撞，四面是沉寂灰色，沒有一點生動鮮豔的，然而，你忽然抬頭看見高高的山壁上有幾個天然的石洞，三層樓的亭子間似的，一對人兒促膝而坐，只憑頭髮式樣的不同，你方能辨認出一個是女的，他們被雨趕到了那裏，大概聊天也聊够了，

現在是離開着「本札記簿」，頭邊在一處，一同在看，——試想一想，這樣一個場面到了你眼前時，總該和在什會公園裏看見了長椅上有一對兒在假倚低語，頗有點味兒不同罷？如果在公園時你一眼瞥見，首先第一會是「這裏有一對戀人」，那麼，此時此際，倒是先感到那樣一個沉悶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這麼兩個人，是一個「奇蹟」，使大自然頓時生色！他們之是否戀人，落在問題之外。你所見的，是兩個生命力旺盛的人，是兩個清楚明白生活意義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們不倦怠，也不會百無聊賴，更不至於從胡鬧中求刺戟，他們能够在任何情況之下，拿出他們那一套來，怡然自得。但是什麼能使他們這樣呢？

不過仍舊回到「風景」罷；~~這裏~~人依然是「風景」的構成者，沒有了人，還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內生活極其充滿的人作為這裏的主宰，那又有什麼值得懷念？

再有一個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樹可以稱為林，那麼這裏要說的，正是這樣一個桃林。花時已過，現在綠葉滿株，却沒有一個桃子。半片舊石磨，是最漂亮的圓桌面，幾尺斷碑，或是一截舊階石，那又是難得的几案。現成的大小石塊作為凳子，——而這樣的石凳也還是以奢侈品的姿態出現。這些怪樣的傢具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這裏有一個茶社。桃林前面，有老百姓種的蕎麥，也有大麻和玉米這一類高桿植物。蕎麥正當開花，遠望去就像一張粉紅色的地毯，

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風，靠着地氈的邊緣。太陽光從樹葉的空隙落下來，在泥地上，石傢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黃色。偶爾也聽得有草虫在叫，帶住在林邊樹上的馬兒伸長了頸子就樹幹搔癢，也許是樂了，便長嘶起來。「這就不壞」！你也許要這樣說。可不是，這裏是有一般所謂「風景」的一些條件的！然而，未必盡然。在高原的強烈陽光下，人們喜歡把這一片樹蔭作為戶外的休息地點，因而添上了什麼茶社，這是這個「風景區」成立的因緣，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枝桃樹，半升磨石，幾尺斷碣，還有蕎麥和大麻玉米，這些其實到處可遇的東西，看成了此所謂風景區的主要條件，那或者是會貽笑大方的。中國之大，比這美得多的所謂風景區，數也數不完，這個值得什麼？所以應當從另一方面去看。現在請你坐下，來一杯清茶，兩毛錢的棗子，也作一次桃園的茶客罷。如果你願意先看女的，好，那邊就有三、四個，大概其中有一位剛接到家裏寄給她的一點錢，今天來請請同伴。那邊又有幾位，也圍着一個石桌子，但只把隨身帶來的書籍代替了棗子和茶了。更有兩位虎頭虎腦的青年，他們走過「天下最難走的路」，現在却靜靜地坐着，溫雅得和閩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羣，有坐的，也有蹲的，爭論着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時時嘩然大笑，就在他們近邊，長石條上躺着一位，一本書掩住了臉。這就夠了，不用再多看。總之，這裏有特別的氛圍，但並不古怪。人們來這裏，只為恢復工作後的疲勞，隨便喝點，要是袋裏有錢；或不喝，

隨便談談天；在有閒的只想找一點什麼來消磨時間的人們看來，這裏坐的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簡單，也沒有什麼可以供賞玩，至多來一次，第二次保管厭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時間爲何物的人們卻把這一片簡陋的綠蔭看得很可愛，因此，這桃林就很出名了。

因此，這裏的「風景」也就值得留戀，人類的高貴精神的幅射，填補了自然界的貧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內容的。人創造了第二自然！

最後一段回憶是五月的北國。清晨，窗紙微微透白，萬籟俱靜，瞭亮的喇叭聲，破空而來。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貼照簿上所見的第一張，銀白色的背景前一個淡黑的側影，一個號兵舉起了喇叭在吹，嚴肅，堅決，勇敢，和高度的警覺，都表現在小號兵的挺直的胸臆和高高的肩稜上邊。我贊美這攝影家的藝術，我回味着，我從當前的喇叭聲中也聽出了嚴肅，堅決，勇敢，和高度的警覺來，於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氣非常清冽，朝霞籠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見山峯上的小號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覺得他的頰角異常發亮，然而，使我驚歎叫出聲來的，是離他不遠有一位荷槍的戰士，而向着東方，嚴肅地站在那裏，猶如雕像一般。晨風吹着喇叭的紅綫子，只這是動的，戰士槍尖的刺刀閃着寒光，在粉紅的霞色中，只這是剛性的。我看得呆了，彷彿看見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爲他們兩個。

如果你也當牠是「風景」，那便是真的風景，是偉大中之最偉大者！

廿九年十二月于燕子風煙

兩天雜寫之一

報載希特勒要法國獻出拿破崙當年侵俄時的一切文件。在此歐非兩戰場烽火告急的時候，這一個插科式的消息，別人讀了作何感想，自不必懸猜，而在我看來，這倒是短短一篇雜文的資料。大凡一個人忽然想到要讀一些特別的東西，或對於某些東西忽然厭惡，其動機有時雖頗複雜，有時實在也單純得可笑。譬如阿Q，自己知道他那牛山濯濯的癩痢頭是一樁缺陷，因而不願被人提起，由諱癩痢，遂諱「亮」，復由諱「亮」，連人家說到保險燈時，他也要生氣。幸而阿Q不過是阿Q，否則，他大概要禁止人家用保險燈，或甚至要使人世間沒有「亮」罷？倘據此以類推，則希特勒之攫取拿破崙侵俄文件，大概是失敗的預感已頗濃烈，故厭聞歷史上這一幕「英雄失敗」的舊事，因厭聞，故遂要併此文件而消滅之——雖則他拿了那些文件以後的第二動作尚無「報導」，但不願這些文件留在他所奴役的法國人手中，却是現在已經由他自己宣告了的。

但是希特勒今天有權力勒令法國交出拿破崙侵俄的文件，却没有方法把這個歷史從法人記憶中澆去。愛自由的法蘭西人還是要把這個歷史的教訓反覆詆誦而得出了希特勒終必失敗的結論的。

不能禁止人家思索，不能消滅人家的記憶，又不能使人必這樣想而不那樣想，這原是千古專制君王的大不如意事；希特勒的刀鋸雖利，戈培爾之輩的麻醉欺騙造謠污穢的工夫雖復出神入化；然而在這一點上，暫時還未能稱心如意。

我不知軸心國家及其奴役的歐洲各國的報導上，是否也刊出了這一段新聞，如果也有，這豈不是一個絕妙的諷刺？正如在去年希特勒侵蘇之初，倘若貝當之類恭恭敬敬獻上了拿翁的文件去，便將成爲堪付史館紀錄的妙事。如果真那麼麼幹了，那我倒覺得貝當還有百分之一可取，但貝當之類終於是貝當，故必待希特勒自己去要去。

歷史上有一些人，每每喜以前代的大人物自喻。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大野心家亞歷山大，後來凱撒就一心要比他。而拿破侖呢，又思步凱撒的遺規。從拿翁手裏掉下來的馬鞭子，實在早已朽腐不堪，可是還有一個蹩腳的學畫不成的希特勒，硬要再演一次命定的悲喜劇。亞歷山大的雄圖，到凱撒手裏已經縮小，但若謂亞歷山大的射手曾經將古希臘的文化帶給了當時歐亞非的半開化部落，則凱撒的驕騎至少也會使不列顛島上的野蠻人沐浴了古羅馬文化的榮光。便是那位又把凱撒的雄圖縮小了的拿翁罷，他的個人野心是被莫斯科的大火，歐俄的冰雪，燒的燒光，凍的凍僵了，雖然和亞歷山大、凱撒相比，他十足是個失敗的英雄，但是他的禁衛軍又何嘗

不將法蘭西人民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法蘭西大革命的理想，帶給了當時尚在封建領主壓迫下的歐洲人民？「拿破侖的風暴」固然有破壞性，然而，若論歷史上的功罪，則當時歐洲的自中世紀傳來的封建大垃圾堆，不也虧有這「拿破侖的風暴」而被摧毀蕩滌了麼？即以拿破侖個人的作爲而言，他的「拿破侖法典」成爲後來歐陸「民法」的基礎，他在侵俄行程中還留心着巴黎的文化活動，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星期，然而即在此短暫的時間，他也曾奠定了法蘭西戲院的始基，這一個戲院的規模又成爲歐陸其他戲院的範本。拿破侖以「共和國」的砲兵隊長起家，而以帝國告終，他這一生，我們並不讚許，——不，寧以爲他這一生足使後來的神衞巨猾知所炯戒，然而我們也不能抹煞他的失敗了的雄圖，曾在歐洲歷史上起了前進的作用；無論他主觀企圖如何，客觀上他沒有使歷史的車輪倒退，而且是推牠前進一步。拿破侖是失敗了；但不失爲一個英雄！

從這上頭看來，希特勒連拿破侖腳底的泥也不如。希特勒的失敗是注定了的，然而他的不是英雄，也已經注定了。他的裝甲師團，橫掃了歐洲十四國，然而他帶給歐洲人民的，是些什麼？是世紀的黑暗，是瘟疫性的破壞，是梅毒一般的道德墮落！他的豬爪踐踏了蘇維埃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花園，他所得的是什麼？是日耳曼人千萬的白骨與更多的孤兒寡婦！他的失敗是注定了的，而他的根本不配成爲「失敗的英雄」不也是已經注定了麼？而現在，他又耍法國獻出拿破侖侵俄的

文件，如果拿翁地下有知，一定要以杖叩其脛曰：「這小子太混賬了！」

前些時候，有一個機會去遊覽了興安的秦堤。這一個二千年前的工程，在今日看來，似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二千年前，有這樣的創意（把南北分流的二條水在發源處溝通起來），已屬不凡，而終能成功，尤為不易。朋友說四川的都江堰，比這偉大得多，成都平原賴此而富庶，而都江堰也是秦朝的工程。秦朝去我們太久遠了，讀歷史也不怎麼明了，然而這一點水利工程却令我「發思古之幽情」。秦始與漢武並稱，而今褒漢武而貶秦始，這已是聽爛了的老調，但是平心論之，秦始皇未嘗不替中華民族做了幾樁不朽的大事，而秦堤與都江堰尚屬其中的小之又小者耳！且不說「同文書」為一件大事，即以典章法制而言，漢亦不能不「因」秦制。焚書坑儒之說，實際如何，難以究詰，但博士官保存且研究戰國各派學術思想，却也是事實。秦始與漢武同樣施行了一種文化思想的統制政策，秦之博士官雖已非復戰國時代公開講學如齊稷下之故事，但各派學術却一視同仁，可以在「中央的研究機關」中得一個苟延喘息的機會。漢武却連這一點機會也不給了，而且定儒家為一尊，根本就不許人家另有所研究。從這一點說來，我雖不喜李斯，却尤其憎惡董仲舒！李斯尚不失為一懂得時代趨向的法家，董仲舒却是一個儒冠儒服的方士！然而「東門黃犬」，學李斯的人是沒有了，想學董仲舒的，却至今不絕，這也是值得玩味的事。我有個未

成熟的意見，以爲秦始皇和漢武之世，中國社會經濟都具備了前進一步，開展一個新紀元的條件，然而都被遭兩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破壞；不過前者尙屬無意，後者却是有計劃的。秦在戰國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基地上統一了天下，故分土制之取消，實爲適應當時經濟發展的趨向，然而秦以西北一民族而征服了諸夏與荆楚，爲子孫萬世之業計，却採取了「大秦主義」的民族政策，把六國的「富豪」遷徙到關內，就爲的要鞏固「中央」的經濟基礎，但是同時可就把各地的經濟中心破壞了。結果，六國之後，仍可利用農民起義而共覆秦廷，而在戰國末期頗見發展的商業資本勢力却受了摧殘。秦始皇並未採取什麼抑制商人的行動，但客觀上他還是破壞了商業資本的發展。

漢朝一開始就厲行「商賈之禁」。但是「太平」日子久了，商業資本還是要抬頭的。到了武帝的時候，鹽鐵大賈居然擁有原料，生產工具與運輸工具，儼然具有資產階級的雛形。當時封建貴族感得的威勢之嚴重，自不難想像。只看當時那些諸王列侯，在「豪侈」上據說尙相形見绌，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平準」，「均輸」制度，雖對老百姓並無好處，對於商人階級實爲一種壓迫，鹽鐵國營政策更動搖了商人階級中的巨頭。及至「算緡錢」，一時商人破產者數十萬戶，遂蓬勃的商業資本勢力遂一蹶而不振。這時候，董仲舒的孔門哲學也「創造」完成，奠定了「思

想「一尊的局面」。

所以，從歷史的進程看來，秦皇與漢武之優劣，正亦未可作皮相之論罷？但這，只是論及歷史上的功過。如在今世，則秦始皇和漢武那一套，同樣不是我們所需要，正如拿破侖雖較希特勒為英雄，而拿破侖的鬼魂却永遠不能復活了。

一九四二，桂林。

兩天雜寫之二

佛法始來東土，排場實在相當熱鬧。公元三五〇年到四五〇年這不算短的時期中，南北朝野對於西來的或本土的高僧，其欽仰之熱忱，我們在今天讀了那些記載，還是活靈活現。石虎自謂「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我神，所應兼奉」，他對於佛圖澄的敬禮，比稗官小說家所鋪張的什麼「國師」的待遇，都隆重些；他定了「儀注」：朝會之日，佛圖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我們試閉目一想，這排場何等闊綽！

其後，那些「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夏」的國主，什九是有力的護法。乃至定爲國教，一道度牒在手，便列爲特殊階級。佛教之盛，非但空前，抑且絕後。然而那時候，真正潛心內典的和尙却並不怎樣自由。翻譯了三百多卷經論的鳩摩羅什就是個不自由的和尙。他本來好好地住在龜茲國潛研佛法，苻堅聞知了他的大名，便派驍騎將軍呂光帶兵打龜茲國，「請」他進關。

龜茲兵敗，國王被殺，鳩摩羅什做了尊貴的俘虜，那位呂將軍異想天開，強要以龜茲王女給鳩摩

羅什做老婆。這位青年的和尚苦苦求免。呂光說：「你的操守，並不比你的父親高，你爲什麼不肯聽我的話？」原來鳩摩羅什的父親鳩摩炎本爲天竺貴族，乘嗣相位而到龜茲，極爲那時的龜茲國王所尊重，逼以妹妹嫁之乃生鳩摩羅什，所以呂光說了這樣的話。還將鳩摩羅什灌醉，與龜茲王女同溺禁於一室，這樣，這個青年和尚遂破了戒。後來到姚秦時代，鳩摩羅什爲國王姚興所敬重，姚興對他說：「大師聰明，海內無雙，怎麼可以不傳種呢？」就強逼他納宮女。這位「如好戲」的大師於是又一次墮入慾障。這以後，他就索性不住僧房，另打公館，跟俗家人一樣了。這在他是不得已，然而一些酒肉和尚就以他爲藉口，也紛紛奢養外室；據說鳩摩羅什會因此略施吞針的小技，警戒那些酒肉和尚說：「你們如果能够像我一樣把鐵針吞食，就可以討老婆。」每逢說法，鳩摩羅什必先用比喻開場道：「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不用理那臭泥。」卽此也可見他破戒以後內心苦悶了。姚興這種禮賢的作風，使得佛陀耶舍聞而生畏。耶舍是羅什的師，羅什請姚興迎他來，耶舍對使者說：「既然來請我，本應馬上就去，但如果要用招待鳩摩羅什的樣子來招待我，那我不敢從命。」後來還是姚興答應了決不勉強，佛陀耶舍方到長安。

但是姚興這位大護法，還做了一件令人萬分驚愕的事。這事在他逼鳩摩羅什畜室之後五六年，那時有兩個中國和尚道恆道標被姚興看中，認爲他們「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命和尚令姚

顯強逼濟兩個和尚還俗做官。兩個和尚苦苦求免，上表陳情，舉出了三個理由：一，他們二人「少習戒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技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二，漢光武尙能體諒嚴子陵的志向，魏文亦能顧全管寧的操守，所以聖天子在上，到並不需要大家都去捧場；三，姚興是佛教的大護法，他們兩個一心一意做和尚，正是從別一方面來擁護姚興，幫他治國，所以不肯做官並非有了不臣之心。然而姚興不許，他還教鳩摩羅什和其他的有名大師去勸道恆道標。鳩摩羅什等要替道恆道標說話求免，說「只要對陛下有利，讓他們披了袈裟也還不是一樣？」但是姚興仍不許，再三再四叫人去催逼，弄得全國騷然，大家都來營救，這才勉強強把兩領袈裟保了下來。道恆道標在長安也不能住了，逃避荒山，後來就死在山里。

這些故事，發生在「大法之隆，於茲爲盛」的時代，佛教雖盛極一時，真能潛心內典的和尚却有許多不自由。而且做不做和尚，也沒有自由。但姚興這位護法還算是有始有終的。到了後魏，起初是歸宗佛法，敬重沙門，忽而又尊崇道教，嚴禁佛教，甚至下詔「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悉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但不久復興佛教，明詔屢降，做得非常熱鬧。當此時也，「出家人」真也爲難極了。黃冠緇衣大概只好各備一套，看「早晚市價不同」隨機應變了。

兩天雜寫之二

不知不覺，在桂林已經住了三個月。什麼也沒有學得，什麼也沒有做得，就只看到聽到些；然亦正因尚有見聞，有時也感到哭笑不得。

近來有半月多，不拉警報了，這是上次擊落敵機八架的結果；但也有近十天的陰雨，雖不怎麼熱，却很潮濕，大似江南梅雨季節。斗室中霉氣蒸鬱，實在不美，但我仍覺得這個上海人所謂「灶披間」很有意思；別的且不說，有「兩部鼓吹」，勝况空前（就我個人的經驗言），而「立部」之中，有淮揚之樂，有涪沅之樂，亦有八桂之樂，伴奏以鍋杓刀砧，十足民族形式，中國氣派。內容自極猥瑣，然有一基調焉，曰：「錢」。

晚上呢，大體上是寧靜的。但是我自已太不行了，強光植物油燈，吸油如鯨，發熱如鍋爐，引蚊成陣，然而土紙印新五號字，賤目視之，尙如讀天書。於是索性開倒車，廢此「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強光植物油燈，而復古于油盞。九時就寢，味爽即興，實行新生活。但又有「弊」：午夜夢回，木屐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婆蚊聲陣以聾

，如何敢冒昧？只好貼然僵臥，靜待倦極，再尋舊夢了。不過人定總可以勝「天」，油燈之下，可讀木板大字線裝書；此公爲我借得廣西通志，功德當真不小。

而且我又藉此領悟了一點點。這一點點是什麼呢？說來貽笑大方，蓋即明白了廣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內；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無可留戀，洞中則幽奇可戀。石筍似的奇峯，怪石嶙峋，雜生羊齒植物，攀登正復不易，即登臨了，恐除仰天長嘯而外，其他亦無足留戀。不過「石筍」之中有了洞，洞深廣曲折，鐘乳奇形怪狀，厥生神話，丹灶藥爐，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實老聃之外宅，類此種種，不一而足。於是山洞不但可遊，且予人以縹緲之感了；何況洞中復有泉、有澗、乃至有通海之潭？

三星期前，忽喬雄圖，擬游陽朔；同游十餘侶，也「組織」好了，但諸君子皆非如我之閒散，故歸途必須乘車，以省時間。先是曾由賓公設法借木炭車，迨行期既迫，賓公忽病，脈搏每分鐘百八十至，於是壯遊遂無期延緩。但陽朔佳處何在呢？據云：「陽朔諸峯，如筍出地，各不相倚。三峯九巖析成天柱者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旂，如人怒，如馬嘯，如陣將合，如戰將潰，漓江蒞水，網織其下，蛇龜猿鶴，焯耀萬態」（廣西通志），這里描寫的是山形，這樣的山，當然無可登臨，即登臨亦無多留戀，所以好處還是在洞；至於陽朔諸峯之洞，

則就不是幾句話所可說完的了。記一洞的一篇文章，往往千數百言，而有些我尙覺其說得不大具體呢！

還有些零碎的有趣的記載：太真故里據說在容縣新塘里羊皮村，有楊妃井，「井水冷冽，飲之美姿容」。而博白縣西絲蘿村又有綠珠井，「其鄉飲是水，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聚而謀窺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矣必形不具」。然而尤其有意思的，乃是歷史上的一樁無頭公案，在廣西通志內有一段未定的消息，全文如下：「橫州壽佛寺，即應天禪寺，宋紹興中建，元明繼修之。相傳，建文遇革除時，削髮爲佛徒，遁至嶺南；後行脚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餘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部郎中樂章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之學。恐事泄，一夕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爲人所覺，言諸官，達於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壽佛禪寺四大字。」

建文下落，爲歷史疑案之一，類如上述之「傳說」頗多，大抵皆反映了當時「臣民」對於建文之思慕。明太祖晚年猜疑好殺，憶雜書曾載一事，謂建文進言，以爲誅戮過甚，有傷和氣。異日，太祖以棘杖投地，令建文拾之，建文有難色，太祖乃去杖上之刺，復令建文拾之，既乃詔之曰：「我所誅戮，皆猶朽上之刺也，將以貽汝一易恃之杵耳」？這一故事，也描寫到建文之仁厚

及太祖之用心。可是太祖却料不到最大之刺乃在其諸王子中。

明末最後一個小朝廷乃在廣西，故廣西死難之忠臣亦不少；這些前朝的孤忠，到了清朝乾隆年間，皆蒙「恩」與死於流賊諸臣，同受「賜諡」之褒獎。清朝的懷柔政策，可謂到家極了。

X

X

X

X

說到這里，似乎又觸及文化什麼的了，那就順筆寫一點這裏的文化市場。

桂林市並不怎樣大，然而「文化市場」特別大。加入書業公會的書店出版社，據聞將近七十之數。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書四種（期刊亦在內）計，每月得二百八十種，已經不能說不是一個相當好看的數目。短短一條桂西路，名副其實，可稱是書店街。這許多出版社和書店傳播文化之功，自然不當抹煞。有一位書業中人曾因作家們之要趕上排工而有增加稿費之議，遂慨然曰：「現在什麼生意都比書業賺錢又多又穩又快，若非爲了文化，我們誰也不來幹這一行！」言外之意，自然是作家們現在之斤斤於稿費，毋乃太不「爲了文化」。這位書業中人的慨然之言，究竟表裏真相如何，這裏不想討論，無論主觀企圖如何，但對文化「有功」，則已有目共睹，至少，把一個文化市場支撐起來了，而且弄得頗爲熱鬧。

然而，正如我們不但抗戰，還要建國，而且要抗建同時進行一樣，我們對於文化市場，亦不

能僅僅滿足於有書出，我們還須看所出的書質量怎樣，還須看看所出之書是否僅僅爲了適合讀者的需要，抑或同時亦適合於文化發展上之需要。舉個淺近的例，目前大後方對於神仙劍俠色情的文學還有大量的需要，但這是讀者的需要，可不是我們文化發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這兩個需要比較起來，我們就不能太樂觀，不能太自我陶醉於目前的熱鬧，我們還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

大凡有書出版而書也頗多讀者，不一定就可以說，我們有了文化運動。必須這些出版的東西，有計劃，有分量，否則，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文化市場；我們對文化運動無大貢獻，我們只建立了一個文化市場。這樣一樁事業，照理，負大部責任者，應是所謂「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頗多的中國，出版家在這上頭，時時能起作用，過去實例頗多，茲可不贅。所以，我在這裏想說的話，決非單獨對出版家——寧可說主要是對我們文化人自己，但也決不想把出版家開卸在外，因爲一個文化市場之形成，不能光有作家而無出版家，進一步，又不能說與讀者無關。

我想用八個字來形容此間文化市場的幾個特點。這八個字不大好看，但我決不想在罵人，我之所以用此八字，無非想把此間文化市場的幾個特點加以形象化而已，這八個字便是：「鷄零狗碎，酒囊飯桶」！

這應當有一點說明。

前些時候，此間書業公會開會，據聞會有提案，擬對剽襲他家出版品而成書的行爲，籌一對策，結果如何，我不知道。說到剪刀漿糊政策在書業中之抬頭，似乎由來已久，但在目前桂林文化市場上，據說已經相當令人頭痛，目前有幾本銷路不壞的書，都是剪刀漿糊之結果。剪刀漿糊不生眼睛，於是乎內容之龐雜無稽，自屬難免。尤其奇想天開的，竟有剽取魯迅著作中若干段，裏爲一冊，而別題名爲「魯迅自述」以出版者。這些剪來的東西，相應不付稿費版稅，所以獲利尤厚，據說除已出版者外，尙有大批存貨，將次第問世。當作家要求增加版稅發議之時，就有一位書業中人慨然認爲此舉將助長了剪刀政策。這自然又是作品漲價毋乃「太不爲了文化」同樣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却已暗示了剪刀之將更盛。嗚呼，在剪刀之下，一部書之將被依分類語錄體而拆散，而分屬於數本名目不同之書中；文章遭受了凌遲極刑，又復零碎拆賣，這表示了文化市場的什麼呢？我不知道。但這樣的辦法，既非犯法，自難稱之曰鷄鳴狗盜，倒是這樣的書偷出多了，若干年以後也許會有另一批人按照從「永樂大典」中輯書之例，又從而輯還之，造成一「新興事業」，豈不思之令人啼笑皆非麼？但書本遭受凌遲極刑之現象既已發生，而且有預言將更發展，則此一特點不能不有一佳名，故擬題曰「鷄零狗碎」云爾。

其次，目前此間文化市場除了作家抱怨出版家只顧自己腰纏不願作家肚餓，而出版家反辱相諷謂作家「太不爲了文化」而外，似乎都相安無事，皆大歡喜。文化市場被支撐着，熱熱鬧鬧，正如各酒館之門多書業中人一樣熱鬧。熱鬧之中，當然亦出了若干有意義的好書，此亦不容抹煞，應當大書特書。不過，這種熱鬧空氣，的確容易使人醉——自我陶醉，這大概也可算是一個特點。無以名之，姑名之曰：「酒囊」。而伴此來者，七十個出版家每月還出相當多的書，當然也解決了直接間接不少人的生活問題，無怪在作家要求維持版稅舊率時，有一先生曾經以「科學」方法證明今天一千元如果可出一本書到明天便只能出半本，何以故？因物價天天在漲，法幣購買力天天在縮小。由此所得結論，作家倘不減低要求，讓出版家多得利潤，則出版家經濟力日削之後，作家的書也將不能再出，那時作家也許比現在還要餓肚子些罷？這筆賬，我是不會算的，因爲我還沒幹過出版，特揭於此，以俟公算。而且我相信這是一個問題，值得專家們討論。不過可喜者，現在還不怎樣嚴重，新書店尙續有開張，新書尙屢有出版，這大概不能不說是出版家們維持之功罷？文化市場既然還撐住，直接間接賴以生活者自屬不少；而作家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近來還沒有聽見說作家中發現了若干餓卒，而要「文協」之類來布施棺材，光這一點，似乎已經值得大書特書了罷？用一不雅的名兒，便是「飯桶」：這一個文化市場，無論其如何，「大飯桶」

的作用究竟是起了的。於是而成一聯：

飯桶酒囊亦功德，

雞鳴狗盜是雄才。

一九四二，桂林

談排隊靜候之類

等候公共汽車，應當排隊。自從「有礙觀瞻」的木柵拆去以後，候車者的長蛇陣居然排得前齊。當然也還有「弁髦法令」之輩使得羣氓側目，但此輩既非老百姓，自應例外，老百姓確是兢兢業業守法奉紀的。

排隊靜候的習慣確是在這幾年來養成功了。現在是買米，買鹽，買電影票，戲票，輪渡售票處，差不多只要十人以上就會「單行成列」起來。如果有人問我：七年來老百姓得到些什麼？我會毫不遲疑地答道：排隊靜候就是一件。將來有誰要寫一本例如「抗戰期中我民族之進步」一類的書，我以為這一項是不應當遺漏的，因為，從這一項上，也可以證明老百姓程度之如何不夠，連這一點點守秩序的ABC也得訓之又訓而始能，由此可知今日備受盟友指摘的行政效率之低，以及其他種種的不上軌道，理合見怪不怪，而這個責任當然相應由老百姓自己去負了。

而况臭虫外國也有。

不過，要是公共汽車數量充足，要是坐在小洞後邊的售票員眼明手快些，要是……凡須排隊

靜候的場合都添些合理性和計劃性，那自然更好，至少「靜候」的工夫會減少些——雖然這在訓練老百姓之耐性這一點上也許是得不償失的。

時間的意義，在排隊靜候的當兒，好像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來。譬如候車，要是你能斷定每隔半小時或數十分鐘準有一輛車開到，那你的「靜候」便不會沒有時間的意義；又譬如排隊買油鹽之類，要是你能預先見到「靜候」的結果是「今日貨已賣完」，那你大概也要算一算你的時間究竟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浪費掉，然而不幸是兩例之中包含的未知數太多了，叫你簡直不敢再作「時間」換得XYZ的奢望，只是當作在受排隊訓練罷了。但這，實在也只是小市民知識分子如筆者之流的想法。老百姓——「老百姓」的心情不能那樣悠閒。我曾經在某一清晨，經過某街，看見什麼店外的長蛇之陣已經有半里遠，旁人告訴我：此輩排隊靜候者在天未破曉時就已經來了。他們已經等候了四五小時，然而那什麼店的排門依然緊閉，因為，還沒到辦公時間！

這裏我們又碰到了「時間」這兩個字了。同是這兩個字，在門內的辦公者的字典上，自然是和門外的長蛇之陣的靜候者的字典上，各有各的意義的。在門內的字典上，「時間」這兩個字神聖得很，差一秒鐘，大門是不開的；在門外那一羣的字典上，「時間」比腳底下的泥還不如，所以天未破曉就來了。大人先生們聞（不是看見）有此等情形，佛然作色曰：「真是胡鬧，不成話！

一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唉，這樣的老百姓，這樣的落後！太不够程度了，所以公家辦事困難！」

落後，不够程度：摸黑起早什麼店外排隊的老百姓誠惶誠恐不敢——也不知如何自辯。但是儘管落後，老百姓們却懂得比大人先生更明白：要是不會靜候半天所得的結果是「今日貨已售完」，他們也未必那麼高興趕早的。而且，即使摸黑起早，等候五六小時之後「門」開了，但是：里把長的隊伍尚未過半，而「今天貨完」的牌子又掛了出來，老百姓們明天還是要摸黑起早來等候。老百姓的「落後性」就有這樣頑強的。這中間的道理，大人先生們是不願亦不屑想一想，他們大概只淡淡一笑道：「他們的時間不值錢！」

諸如此類，「時間」在各色不同人們的字典上有其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如果要找一個大家字典上意義與價值相同的「時間」，我以為這幾年來我們是用血的代價找得了一個了：這便是「空閒換取時間」一語中的時間。雖然在極少數人的字典上，甚至連這一個「時間」也另有新解的。至于最近這「時間」竟也像摸黑起早者被噎為不值錢，或是會不會弄到那些摸黑起早者的下場，那就請讀者們去想一想罷，事有不忍言者，亦有未許詳言者！嗚呼，時間！

一九四四，七月，十九日，敵犯懷遠。

聞笑有感

笑是喜悅的表示，動物之中，大概只有人類有這本領罷。猴子也能作笑的姿態，但亦不過是姿態而已，看了不會引起快感，或且以為醜。至於微笑，冷笑，苦笑……等等複雜的不盡是表示喜悅而別有滋味的各式之笑，那更是人類所獨特擅長。

簡直可以說，愈是思想情緒複雜且多矛盾而變態的人，笑之內容也愈為複雜而多變態；原始意味的笑——即天真的笑，差不多很難在這樣人們的臉上找到了，通常我們見到的，倘不是虛偽的笑便是惡意的笑，這又是人類比猴子高明的地方，猴子大概作不出虛偽的笑，而且大概也沒有惡意的。

但是也還有若干種類的笑，其動機似可索解却又未必竟能索解。譬如青年的瘋女人，一絲不掛出現於大街，此時圍觀者如堵，笑聲即錯雜起落，如果再有一個無賴之徒對瘋婦作猥褻之動作，旁觀者就一定會哄然大笑。這樣的笑，當然並不虛偽，確是「真情之流露」，遠遠聽去，你會猜想這所笑者一定是一件可喜的事；那麼，這是惡意的笑了，可又不盡然，當然說不上含有善意

，但圍而觀者之羣其中百分之九十九與此瘋婦確無絲毫的仇恨，既無仇恨，則看見她在那樣悲慘的境地而猶受無賴子的欺侮，縱使不生同情亦何必投之以惡意的笑呢？然則是缺乏同情心的緣故麼？在此一場合，圍觀者同情心之薄弱，即就「圍觀」一舉已可概見，自不待論；但是同情心之缺乏並不一定造成那樣縱聲狂笑的結果。假如有一位紳士在場，恐怕他是不笑的，雖然這位紳士跟圍觀之羣比較起來，心地要執樸得多，白天黑夜，他時時存着損人利己之心，而圍觀之羣却確是善良（雖則趕不上那位紳士的聰明）的人們。

這樣看來，恐怕只能把這種變態的笑解釋為並無意義的動作，這恐怕是神經受了不尋常的一刺驟然緊張而起的一種反應，這中間並無惡意，當然也未必帶有幸災禍的成份。但「一半是神，一半是獸」的萬物之靈，在這當兒，却突然褪落了「神」的光圈，而呈現了赤裸裸的「獸」的本色，大概也是不能諱言的事罷？

在街頭遇到了這種的笑，並不比在雅緻的客廳中遇到了虛偽的笑，更為舒服些，不過那不舒服的滋味應當是不相同罷？前者是悲哀而後者是憎惡。在前者，我們感到文化教育教養力之不足，在後者，我們看見了相反的作用——「人」非但未能淨化，反倒被「教養」得更卑鄙醜陋了！我不得不承認：那種無意義的原始性的優笑，雖使我聽了戰慄，可是比起客廳中高貴人們的虛偽

的——可又十分有禮貌的笑，至少是「天真」些罷？

不過在大街上那樣笑的機會究竟不多，常見者乃在室內。在文雅的背景前，有「教養」的嘴巴繪聲繪影地在敘述一些慘厲的故事的時候，聽到了那樣野性的放縱的笑聲，其使人毛骨聳然，當亦不下於大街，這時的笑，當然決無虛偽，可也不見得如何「天真」，這裏可以嗅出自私的氣味，講述者和聽而笑者似乎都把這當作一種娛樂，一種享受，他們似乎習慣了要把血腥的人類靈魂被踐踏的故事當作飽食以後的消化劑，把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開心的資料。這原來不是沒有「教養」的人所知道的。

人們說近來有些話劇，頗重「噱頭」，於是慨歎於「低級趣味」之盛行，但是，見「噱頭」而笑，即使是「低級趣味」罷，亦不過趣味低級而已：事有甚於此者，即並非「噱頭」而且簡直是不應當笑的地方，也往往聽到噴發的笑聲，叫人突然覺得這就是瘋女人出現在大街上所引起的同樣的聲音。有一次我看電影，就在我近旁發出了這樣變態的笑聲：後來我留心看那幾位「可敬的人們」，確也是衣冠楚楚，一表堂堂，標明是有「教養」的——即不是粗人，換一句話，就是那些看膩了「噱頭」轉而要從血腥和眼淚中尋取笑料的人！

人的感情有能變態到這樣的地步的，這是人的墮落呢或是「進化」，自不待論：不過再一想

，在衆人的骷髏堆上建築起一人的尊嚴富貴的，今世實在太多了，那麼，僅僅在話劇或電影上找尋這樣發洩的傢伙，實在也不足責了。

剩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到了還沒看膩「噓頭」的小市民羣的錢袋也不大寬裕而不得不依靠那些連「噓頭」都已看膩轉而要從血脈與眼淚——別人的痛苦中找尋娛樂的人們作爲基本觀眾時，我們的戲劇將怎樣辦呢？

也許這是杞憂，現在這大時代有的是能使人痛快地一哭因而也就能健康地一笑的題材。但是看到那依然如故的「尺度」我不能不擔心我這個憂慮遲早要成爲問題了。

一九四四年十月

談 鼠

閒談的時候偶爾也談到了老鼠。特別是看見了誰的衣服和皮鞋有嚙傷的痕跡，話題便會自然而然的轉到了這小小的專過「夜生活」的動物。

這小小的動物羣中，大概頗有些超等的「手藝匠」；牠會把西裝大衣上的膠質鈕子修去了一層邊，四周是那麼勻稱，人們用工具來做，也不過如此；女太太們的梆硬的衣領也常常是牠們顯本領的場所，牠們會巧妙地揭去了這些富於漿糊的衣領的裏邊的一層而不傷及那面子。但是最使我驚佩的，是牠們在一位朋友的黑皮鞋上留下的「傑作」：這位朋友剛從東南沿海區域來，他那雙八成新的烏亮的皮鞋，一切都很正常，只有鞋口周圍一縷是白的，乍一看，還以為這又是一種新型，鞋口鑲了白皮的滾條，——然而不是！

對於諸如此類的小巧的「手藝」，我們也許還能「幽默」一下。——雖然有時也實在使你「啼笑皆非」。

可惜牠們喜歡這樣「費厄潑賴」的時候，並不太多，最通常的，倒是集惡劣之大成的作法。

例子是不怕沒有的，此方：因為「短被蓋」只顧到頭，朋友A的腳指頭便被看中了，這位朋友的睡勁也真好，迷迷糊糊地，想來至多不過翻個身罷了，第二天套上鞋子的時候這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急忙檢查，原來早已血污斑剝。朋友B的不滿週歲的嬰兒大哭不止，渴睡的年青的母親撫拍無效，點起火一看，這可駭壞了，要兒滿面是血了，措乾血，這才看清被嚙破了鼻肉了。爲了剝削腳指頭上和鼻孔邊那一點穢膩的東西，竟至於使被剝削者流血，這是何等的霸道，然而使人聽了髮指的，還有下面的一件事。在K城，有一位少婦難產而死，遺體在太平間內停放了一夜，第二天發見缺少了兩顆眼珠！

「鼠竊」這一句成語，算是把牠們的善於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永遠不能光明正大的特性，描摹出來了。然而對於弱者，牠們也是會有滲胆的。牠們敢從母雞的溫暖的翅膀下強攫了她的雛兒。這一匹可憐的母雞，抱三個卵，化了二十天工夫，她連吃也無心，肚子下的羽毛也褪光了，憔悴得要命，却只得了一隻雛雞，這小小的東西一身絨毛好像還沒大乾，就啾啾的叫着，在母親的大翅膀下鑽進鑽出，灑幾粒米在牠面前，牠還不知道吃，而瘦鯁極了的母親咕咕地似乎在教導牠。可是當天晚上，母雞和小雞忽然都叫得那樣慘，人們急忙趕來照看，小雞早已不見影蹤，母雞却蹲在窠外地上，——從此她死也不肯再進那窠了。

其實鷄們平時就不願意伏在窩裏睡覺，孵卵期是例外。平時牠們睡覺總喜歡蹲在什麼竹筐子的邊上，這大概是爲了防備老鼠。因此也可想到爲了孵卵，母鷄們的不避危險的精神有多麼偉大！江南養鷄都用有門的竹籠，這對於那些慣會放臭屁來自救的黃鼠狼，尚不失爲有效的防禦工事，黃鼠狼的軀幹大，鑽不進那竹籠的小方格。但是一位江南少婦在桂林用了同樣的竹籠，却反便宜了老鼠；鷄被囚於籠走不開，一條腿都幾乎被老鼠咬斷了。

但儘管是多麼強橫，對於「示衆」也還知道懼怕。捉住了老鼠就地釘死。暴屍一二日，據說是頗有「警告」的效力的。不過這效力也有時間性，我的寓所裏有一間長不過四尺寬二尺許的小房，因其太小，就用以儲放什物，其中也有可吃的，都蓋藏嚴密，老鼠其實也沒法吃到，然而老鼠不肯斷念，每夜都要光顧這間小房。牆是竹筴塗泥巴的牆，牠們要穿一個孔，實在容易得很。最初我們還是見洞即堵，用瓦片，用泥巴。用木板，後來堵住了這里，那邊又新穿了更大的洞，弄得到處千瘡百孔，這才從防禦而轉爲進攻。我們安設了老鼠夾子。第一夜，到了照例的時光，夾牆中固然照例蠢動，聽聲音就知道是一頭相當大的傢伙，從夾牆中遠遠地奔來，毫不躊躇，熟門熟路，直奔向牠那目的地了，接着：拍叉一聲，這目無一切的傢伙固然種瓜得瓜。這以後，約有個把月，絕對安靜，但亦只有個把月而已，不能再多。鼠夾子雖已洗過薰過，可再也無用。當

然不能相信老鼠當真通靈，然而也不能不佩服牠那厲害的嗅覺。我們特別要試驗這些貪婪的小動物抵抗誘惑的決心有多大多久。我們找了最香最投鼠之所好的東西裝在鼠夾子上，同時厲行了澈底的「清野」，使除此引誘物外，簡直無可得食。一天，兩天，沒有效；可是第三天已經天亮的時候，我們被拍叉的聲音驚醒，一頭少壯的鼠子又捉住了，想來這是個耐不住饞的莽撞的傢伙。

然而這第二回所得的安靜時間，只有一個星期。

不但嗅覺厲害，老鼠大概又是多疑的，而且警覺心也提得相當高。鼠藥因此也不能絕對有效，除非別無可食之物，鼠們未必就來上當；特別是把鼠藥放在特製的食物中，什九是徒勞。掃蕩老鼠似乎是個社會問題，一家兩家枝枝節節爲之，決不是辦法。記得前些時候，報上載過一條新聞，倫敦的警察和市民合作，舉行了大規模的掃蕩，全市於同一日發動，計用去鼠藥數萬磅，糧食數噸，廚房，陰溝，一切陰暗角落，全放了藥，結果得死鼠數百萬頭。數百萬這數目，不知佔全倫敦老鼠總數的幾分之幾，數百萬的數目雖然不小，但說倫敦的老鼠全部毒死，恐怕也不近事理。自然，鼠的猖獗是會因此一舉而大大減少的，不過這也恐怕只是一時而已。

似乎凡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就不會沒有偷偷摸摸的又狡猾貪婪的醜類。所差者，程度而已。報上又登過一條消息：重慶市衛生當局特地設計了防鼠模範建築。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模範建築會比

竹笆塗泥巴的房屋要好上幾百倍；然而我們却不敢相信這樣一道防綫就能擋住了老鼠侵略的凶焰，當四周都是老鼠繁殖的好場所的時候，一幢的好房子也只能相當的減少鼠患而已。老鼠是一個社會問題，沒有市民全體的總動員，一家兩家和鼠鬥爭，結果是不容樂觀的。但這不是說，鬥爭乃屬多事，爭爭總能殺殺牠們的威；不過一勞永逸之舉，還是沒有。

人們的拿手好戲是妥協。和老鼠妥協，恐怕也是由來已久的，人，倒底比老鼠會打算盤，權衡輕重之後，人是寧願供養老鼠，然不願因小失大，損壞了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鼠們大概會洋洋得意，自認勝利，而不知已經中了人們的計。有一家書店把這妥協方策執行得非常徹底，他們研究出老鼠們喜歡換胃口，有時要吃麵，有時又要吃米，可是老鼠當然不會事前通知，結果，人們只好每晚在書棧房裏放一碗飯和一碗漿糊，任憑選擇。據說這辦法固然可以相當減少了書籍的損壞，如果這樣被供養的鼠類會減低牠們的繁殖力，那問題倒還簡單；否則，這妥協的辦法總有一天會使人們覺得負擔太重了一點。

在鼠患嚴重的地方，貓是照例不稱職的。換過來說，也許本來是貓不懶貓，這才老鼠肆無忌憚，而且又因為鼠患太可怕了，貓被當作寶貝，貓既養尊處優，藉鼠以自重，當然不肯出力捕鼠了；不要看輕牠們是畜生，這一點騙人混飯的訣竅似乎也很內行的呢！

三月十七日

東條的「神符」

不久以前，在報上看到一條新聞，說是日本軍閥送給希特勒一份厚禮：神符一萬！

此所謂「神符」，大概也就是「千人針」之類，佩帶了這種神符，假定可以消災免難，吃了敗仗也還可以逃得一條命罷？我們提到的日本俘虜身上就有一兩個「千人針」的。東條拿這樣的寶貝恭而敬之送給希特勒，而且不遲不早，正當希特勒在東線大吃敗仗，一再「依照原定計劃」狼狽潰竄，而「歐洲堡壘」又連挨每天幾千架飛機的轟炸，第二戰場即將開闢的時候，受到這一萬神符，希特勒真該哭笑不得？

這倒也不能說東條存心開希特勒的玩笑，這一萬張神符就等於說：「朋友，對不起，我自願不暇，祈求菩薩保佑你吧！」

東西兩個強盜之末日不遠，這已是命定的了。然而也不可遂謂他們已經沒有最後掙扎的力氣。老鼠被追急了的時候，也會張牙舞爪向人反撲；何況德日兩法西斯國家的軍事力量仍很強大。

日本的武力，不用說是比不上德國的。可是在太平洋上牠的防禦網還沒被破壞。在中國戰場牠還

能狼奔豕突，隨心所欲。據中央社太平洋美軍總部特派員五月二十三日電：「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所遭遇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突破加羅林和馬里亞納兩羣島的日方防禦網，以攻到中國海岸。這是一個困難工作，因為兩羣島共有島嶼一千四百座，加羅林羣島以庫薩伊為起點，在馬紹爾的瓜加林西南四百二十五哩，由這裏有一條二十哩長纒纒如鎖鏈的島嶼羣，通過帛琉。帛琉距菲律賓羣島日方重要根據地利華茲，不過五百二十九哩。」只看這簡單的敘述，就可以想見太平洋上的天然障礙。也是日本軍閥頑抗的一付本錢了。但是這不是說，這樣的障礙就無法克服。大家都知道：要掃除這巨大的防禦網，只有鋼鐵和火。而在鋼鐵和火的背後還須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和火樣旺盛的攻擊精神。

話再說回來，東條的所謂「神符」。日本軍閥固然乞靈於所謂「神符」。可是他們也絕不忘記了鋼鐵和火。他們從沒一日忘記了加緊軍火的生產，飛機，坦克，大炮；他們也從沒一日放鬆了對於佔領區的統制，榨取，和掠奪一切的人力和物資。

而且他們的所謂「神符」，也不單是東條送給希特勒那一套，他們還有更凶險毒辣的「神符」。——這是挑撥離間同盟國家的精誠團結的「神符」！這一套「神符」，東條有他的東條版，希特勒有他的希特勒版；佩這一套「神符」的鬼魅，現在還戴着各式各樣的面具。鑽在反法西斯

的陳營內與妖作怪。

東條還有其他的「神符」。在緬甸，馬來亞，菲律賓；東條的「神符」是民族解放的騙局，組織偽軍代替「皇軍」送死；印奸鮑斯是其中最大的一張「神符」。在中國淪陷區，除了汪逆傀儡在扮演猴戲，東條的「神符」就更多了。姑不說用奸商偷運自由區的糧食棉花木材等等，單看他們的「王道文化」：鴉片，白面，賭博，娼妓，讀經，色情文學，封建毒素的電影，——這許多多五光十色的「神符」像天羅地網一般，將我們淪陷區的同胞送入了阿鼻地獄。

不光是這些，東條還有一張可怕的「神符」；說是可怕，因為一般人民不容易認清牠是東條所玩弄的「神符」，因為牠和鴉片，白面，嫖，賭等等比起來，另是一付面孔。這是什麼呢？這就是各種神道迷信的小小的宗教團體；這是具有地方性的小團體，念呪，授符，設壇，聚徒，方式大同而小異。漢奸和間諜以此為隱藏所，為策源地，來進行各種危害民族的勾當，例如北方的「無極道」。這些地方性的神道迷信團體好像是垃圾堆，分子龐雜，最易藏垢納污，信徒們知識愚蒙，又最易受人利用。這便是何以會被日本軍閥看中了，變成他們的「神符」。

上面所舉各種無形的「神符」，實在都比東條送給希特勒的那一種有形的「神符」凶險得多，而且也有相當的效驗。但是我們又不要以為東條給他自已士兵的，只有那不中用的幾寸廢紙！

「那滑稽的所謂「神符」；這一道有形的「神符」既不能使佩帶者刀槍不入，也不會催眠他使拚死命。我們捉到的俘虜身上大都會有這些玩意兒，就是一個明證。然而日本士兵的頑強卻又是個事實。最近報上登載緬境一盟軍高級將領的話，也就說到，「日軍是會打仗的，而且有着像螞蟻一樣的耐力」。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日本士兵「有着螞蟻一樣的耐力」呢？究竟日本士兵的頑強性的根源在那里呢？是不是東條給他的士兵的還有另一種「神符」？

可以說是有的。日本軍閥另有一道使他們的士兵頑強拚死的「神符」。

說出來似乎並不出奇，這一道無形的「神符」，對日作戰七年的我們早已領教過的。戰爭初期，這祕密就被發現了。一個受傷之後尚在頑抗而終於被我們生俘了來的日本士兵，在受到我們的優待以後，才說出他所以拚死命頑抗的原因道，「我以為被俘了是要砍頭抄心肝的，現在才知道那是騙我們的胡說。」日本軍閥曾經怎樣無恥地欺騙着恐嚇着他們的士兵——要他們拚死要他們賣命！

這是一個老故事，——雖然曾經有過效驗然而又是多麼拙劣的一道「神符」。不過現在這一道日本「神符」又修改了一些面目。日本軍現在要他們的士兵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引起了全世界人民怎樣深刻的仇恨，日本是已經被放在天怒人怨的地步，日本軍閥現在要用全世界人民

復仇的決心來作爲資本，恐嚇着驅策着他們統治下的日本人民士兵爲他們出死力，賣命！這就是「日本軍有着像螞蟻一樣的耐力」的原因。日本士兵現在是被消滅的恐怖所襲擊而瘋狂地拚命！日本人民現在也是在消滅的恐怖下拚命！這是東條他們給他們的士兵們的一道無形的「神符」！東條不止一次地狂喊的「帝國已臨生死關頭」，就是這一道無形「神符」的咒文。從這呼聲，我們看出了日本軍閥的戰慄，日暮途窮；然而我們也須辨察出這中間的陰狠，我們不能一味高興。

和「千人針」同屬一類有形的日本「神符」是不足畏的，這只是荒唐滑稽的玩意。然而上述的各式各樣無形的「神符」卻有牠們各自的作用。爲了對抗這些「神符」，我們也得有些「靈符」——如果我們不覺得「符」字借用得近乎迷信。

我們對抗的「靈符」是什麼呢？

第一，是鋼鐵加上「人和」；第二是紀律加上民主。我們不但要用鎗砲武裝我們的士兵，也要用進步的政治思想來武裝他們的頭腦。我們要用民族團結和民主政治來消解東條他們的一切五光十色的毒辣的「神符」！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狼

當紅軍的鐵槌準對着法西斯老窩加以最後一擊的時候，我們所聽到的最後一次的希特勒的狂嗥，是他自稱是一條狼。

我覺得他一生之中也許就只有這一句話算是老實話。在野獸之中，狼是最和法西斯惡棍相像的了。

狼是殘酷的，但狼又很狡猾。

多年以來，早有許多事實揭示了法西斯狼的殘忍，波蘭境內許多大規模屠殺人民的「工場」，使用毒氣，熬人油等等慘絕人寰的事實，一年以前，蘇聯方面早就有過詳細的報導。可是「高貴的紳士們」似乎都還不大相信，直到本年三月後，英國的調查團看到了波亨瓦德集中營內的一切，發現了被剝掉皮的屍身，又發現了集中營司令的老婆將人皮裝訂書面或用作燈罩，這才相信「過去所聽說的德方集中營內的種種暴行，實在並沒誇張」，而善良的瑪維斯·泰特夫人竟至於「週身戰慄，臉色蒼白，午飯也吃不下」了。千千萬萬條生命才換了這一個認識，實在也太慘，

但到底算是看明白了。恐怕只有狼的同族——狗，還想用花言巧語把這些罪惡來美化。

但是也還有人裝作不懂得狼也很狡猾。世界聞名的童話早就把狼的狡猾編成了動人的故事，在不能以暴力取勝的時候，狼會化裝成爲善良的老婆婆，用親熱的聲調哄騙不更事的小孩子，人民智慧之結晶的民間文學就這樣形象化了狼的狡猾，所以現在即使是不更事的小孩子也都知道狼是十分狡猾的了。

法西斯狼正也打算依靠它的狡猾來逃避死亡。法西斯狼的狡計着眼在明天，也着眼在今天，它正在忙忙碌碌把「狼種」偽裝成無數式樣，千方百計地偷運到那些國外的「法西斯溫床」，或者掩藏在德國內部，它也使用苦肉計，將一些政治上的老狐狸，工業上的大亨，「攔淺」在盟軍的佔領區，希望保存它搏噬的爪牙；而最後一計則竟是法西斯特務頭子希姆萊出面表演了向英美求和的滑稽戲。（寫這篇短文的時候，這一齣戲還沒收場呢！）

法西斯狼是狡猾的，然而它的萬一的希冀與其說是依靠在這些狡計的本身，倒不如說是依靠在世界上也還有人裝作不懂得狼也是十分狡猾似的。可惜今天是一九四五年，不是一九三八年了，經過了二年的地獄生活而且終於靠自己的力量獲得了解放的歐洲人民，再不是那麼容易欺騙了！

老狼是只好剝皮搗草了，小狼們還來得及偽裝罷？趕快丟開「我的奮鬥」，捧起聖經，喃喃地念起「民主，民主」來。自然，唸「民主」的嘴巴上，人血還沒乾呢，但在一心想我看家狗的人們看來，豈不十分可愛？

這些「可敬的紳士們」似乎忘記了老狼本是小狼長大的，而且在反噬餒餒者之前，豈不也怪像一條看家狗麼？

上文云云，還是四月底看報所感，寫完以後，本想寄給一個朋友所辦的刊物，了却一筆文債；不料老天連下了兩天雨，小河水漲，石梁淹沒，而要寄信則非過河不可。待及水退，歐洲局勢則已有變。希姆萊的「滑稽戲」終於在「伯納杜物伯爵」扭扭捏捏姿態中閉了幕，跟着上場的是什麼海軍上將鄧尼茲了。這也是一條老狼，開場白便是「希特勒業已戰死」，而且公然命令德軍道：「對西方盟軍放下武器，對東方蘇軍拚命作戰！」接着又是「單獨向英美盟軍投降」的一齣戲。陰險毒辣可謂登峯造極，然而卑劣無恥也不是人們想像得到的。

當然，法西斯野獸這最後一計，也不是毫無所見。目無民衆的人看到別人國家裏也只見有那一批「同氣相投」的大亨，而大亨們確也頗能心心相印，開始相顧而笑，並且努力想造成一種印象，好像那繼承希特勒的鄧尼茲確是一向專管唸佛，他那饞吻的人血早已乾的連痕跡也沒有了。

可惜天下事未能盡如「狼」意。民主國家裏有民衆，而民衆也不糊塗；反蘇這法實今天祭起來已經不靈了。「東拚西讓」陰謀的收獲如何，只看五月八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在柏林簽字，也就可以明白。

但法西斯狼狡計的精采部分，我以為尙不在此。「東拚西讓」政策並不自鄧尼茲一文告開始，早在萊因之戰就已「忠實」地執行了。而所以終無結果者，原因在於今天沒有任何東西能够阻擋紅軍的雷霆萬鈞的打擊！自從斯大林城戰役以後，法西斯野獸在東綫天天在拚，然而始終拚不過，這有什麼辦法？所以「東拚西讓」政策的作用，表面上是軍事的，骨子裏却是政治的。「魯爾區」的工業是保下來了。自然，克里米亞會議所決定的分區共管（佔領）德國，大概是一定會被執行的，但在法西斯看來，這還不是「寄之外府」麼？法西斯政治的軍事的金融的工業的巨頭們都陸續在「西讓」地帶中被發現，被「俘」了；當然這些法西斯頭目們有理由自信這就安全保險了。西方盟軍有些將領用「友好敵人」的態度對待將降降卒，大罪犯戈林被「俘」時還和捕他的將軍握手，艾帥不得不發文告指斥這些行爲與他意旨相反，希姆萊的躲藏地點據說在英第二軍防區之內，這特務頭子據說還帶着不少黨衛軍，而報上又傳「停戰」後投降的二三百萬德軍將被釋放回他們的「祖國」；——這一切，難道不是「西讓」政策政治上的收穫？而這，不過僅是今天

透漏出來的一個開端而已！

可見今日之下甚至也還有人想把老狼們也保留下來。這些「可敬的人們」想得一條看家狗實在想得快發瘋了。而昨日還在啃人骨頭的狼們也在指天發誓，從此改心做乖乖的看家狗。一個要，一個情愿，事情大可圓滿，所可惜者，並不需要看家狗而且創痛猶深的歐洲被蹂躪國家的人民，不肯再做血祭的犧牲品了！路透社報告最近法國市選舉的結果，關頭一句話就是「法國在向左轉！」驚訝之情，躍然紙面。法西斯狼們當然指望這是他們再被縱容的政治資本，而一心想得看家狗者當然更覺得看家狗之物色實不容緩。可憐這些短視的先生們竟始終不悟：只因你們一心想把狼們當作看家狗，所以歐洲人民不得不「左傾」起來！六年來血淋淋的事實教訓了歐洲人民，防止狼禍的方法，只有左一點，在有人存着幻想豢養狼的時候，更只有左一點。歐洲人民大概也看得明白：即使「左」到像蘇聯似的，又有什麼壞處呢？當希特勒瘋狂亂喊，不可一世的時候，能夠給以迎頭痛擊的，就只有蘇聯呵！

如果以為上面的話不免有左租之處，那還可以請看一個小小的記載。這是英國廣播公司記者羅拔·雷特所描寫的一個德國挺進隊上校的「優美」生活：

「這一個德國家庭，牆上掛的，有俾士麥，與登堡，和希特勒的照片，還有德國裝甲部隊在

法國公路上輾過法國士兵屍體的畫片，還有挪威、蘇聯、波蘭的風景人物油畫；這位上校顯然旅行過許多地方了。

「他的書架上，非常普魯士化，有非常多的軍事書籍。書架邊上的裝飾品是一個白砲彈。還有一個飛機炮彈，上校拿來當作鎮紙的。」

「而上校顯然又是一位執樁子；有一口大衣櫥，好幾只衣箱，有最漂亮的制服，大衣，鑲銀的皮帶和羊皮手套。」

「在一個孩子們的臥室裏，牆上貼的全是德國的空軍英雄的相片，每有空隙的地方，便掛着一柄納粹的寶劍，孩子們的玩具實在巧妙，大都是德國坦克，裝甲車和大砲。這些大砲是可以射擊的，正和他們的爸爸以及爸爸的朋友們所用的真砲一樣。還有孩子們玩的棋，棋子是飛機和軍艦，棋盤上的邊界就是英吉利海峽，名之曰「向英國進攻。」孩子們知道他們的爸爸沒有渡過海峽，而這將是他們將來的責任。」

這就是法西斯惡棍如何教育他們的孩子。

這就是法西斯小孩們所受的教育。他們念念不忘英吉利海峽，而也還有發昏了的人癡心妄想收養這些小孩們連同牠們的爸爸們做看家狗呢？

森林中的紳士

據說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野獸，這就是豪豬，這是「森林中的紳士！」

這是在頭部，背部，尾巴上，都長着鋼針似的刺毛的四足獸，所謂「紳士相處，應如豪豬與豪豬，中間保持相當的距離，」就因為太靠近了彼此都沒有好處。不過豪豬的刺還是有形的，紳士之刺則無形，有形則長短有定，要保持相當的距離總比無形者好辦些，而這也是摹仿豪豬的紳士們「青出于藍」的地方。

但豪豬的「紳士風度」之可貴尚不在那一身的鋼針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張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瀟灑悠閒，實在也到了殊堪欽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壞的灌木叢中玩上一個整天，很有教養似的邊走邊哼，逍遙自得，無所用心，宛然是一位樂天派。它不喜羣的生活，但也並非完全孤獨，由此可見它在「待人接物」上多麼有分寸。

若非萬不得已，它決不旅行，整年整季，它的活動範圍不出三四里地。一連幾星期，它只在三四棵樹上爬來爬去；它縮在樹枝間，從容自在的啃着樹皮，啃得倦了，就打個睡；要是睡中

一個不小心倒栽下來，那也不要緊，它那件特別的長毛大衣會保護它的尊軀。

它也不怕跌落水裏去，它全身的二萬刺毛都是中空的，它好比穿了件救生衣，一到水裏，自會浮起來的。

而這些空心針似的刺毛又是絕妙的自衛武器，別的野獸身上要是刺進了幾十枚這樣的空心針，當然會有性命之憂，因為這些空心針是角質的，刺進了溫濕的肌肉，立刻就會發脹，而且針上又遍佈了倒鉤，倒鉤也跟着脹大，倒鉤的斜度會使得那針愈陷愈深。因此，遇到外來的攻擊時，豪豬的戰術是等在那裏「挨打」，讓敵人自己碰傷，知難而退。因為它那些刺毛只要輕輕一碰就會掉落，而又因其尖利非凡，故一碰之下未有不刺進皮肉的。

然而具有這樣頭等的自衛武器的它，却有老大的弱點；肚皮底下沒刺毛，這是不設防地帶，小小的老鼠只要能夠設法鑽到豪豬的肚皮底下，就是勝利者了。但尤其脆弱者，是豪豬的鼻子。一根棍子在這鼻尖上輕輕敲一下，就是致命的。這些弱點，豪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遇到敵人的時候，它就把腦袋塞在一根木頭下面，這樣先保護好它那脆弱的鼻子，然後四腳收攏，平伏地面，掩蔽它那不設防的腹部，末了，就聳起渾身的刺毛，擺好了「挨打」的姿勢，當然，它還有一根不太長然而也還強壯有力的尾巴，（和它身長比較，約為五與一之比），真是一根狼牙棒

，它可以左右揮動，敵人要是挨着一下，大概受不住，可是這根尾巴的揮動因爲缺乏一雙眼睛來指示目標，也只是守勢防禦而已。

敵人也許很狡猾，並不進攻，却悄悄地守在旁邊靜候機會，那時候，豪豬不能不改變戰術了。它從掩蔽部抽出了鼻子，拼命低着頭，（還是爲的保護鼻子），倒退着走，同時猛烈揮動尾巴，這樣「背進」到了最近一棵樹，它就笨拙地往上爬，爬到了相當高度，自覺已無危險，便又安逸逸躺在那裏嚼起嫩枝來，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這真是典型的紳士式的「鎮靜」。的確，它的一切生活方式——連它的戰術在內，都是典型的紳士式的。但正像我們的可敬的紳士們儘管「得天獨厚」，優遊自在，却也常常要無病呻吟一樣，豪豬也喜歡這調門。好好地它會忽然發出了聲音搖曳而淒涼的哀號，單聽那聲音，你以爲這位「森林中的紳士」一定是碰到絕大的危險，性命就在頃刻間了；然而不然。它這時安逸逸坐在樹梢上，方正而持重的臉部照常一點表情也沒有，可是它獨自在哀啼，往往持續至一小時之久，它這樣無病而呻吟是玩玩的。

據說向來盛產豪豬的安地郎達克山脈，現在也很少看見豪豬了，以至美國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法令來保護它了。爲什麼這樣「得天獨厚」，具有這樣巧妙自衛武器的豪豬會漸有絕種之憂呢？

是不是它那種太懶散而悠閒的生活方式使之然呢？還是因為它那「得天獨厚」之處存在着絕大的矛盾，——幾乎無敵的刺毛以及毫無抵抗力的暴露着的鼻子，——所以結果仍然于它不利呢？

我不打算在這裏來下結論，可是我因此更覺得豪豬的「生活方式」叫人看了寒心。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一日。

右雜談一則：昨日從一堆舊信件中檢了出來。看篇末所記年月日。方才想起寫這一則時的心情，惘然若有所失。當時寫完以後何以又擱起來的原因，可再也追憶不得了。重讀一過，覺得也還可以發表一下，姑以付「新文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記于無陽光室，重慶。

一九四二年試筆

在北半球的我們逢到過年，便預想到寒冬將盡，陽春在望，於是便有了種種新的計劃，新的希望。有人以為在地球繞日而行的橢圓形軌道上，任取一點，算是過年，亦何嘗不可，但我想來，把過年放在冬盡春來的時候，意義自然更好。

我們北半球的人們過冬的時候，南半球的人們正在過夏，然而他們亦不能不跟着我們過年，這有點近乎開玩笑。這是因為人類文明肇源於北半球，往在北半球的文化先進的人民，依他們的主觀（雖然這在他們是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定了過年的時節，南半球的人們便只得奉行了。然而，在他們那邊既是炎夏將完，肅殺來臨，則過年的感想大概會和我們的很不同罷？不但他們，即使是住在兩極圈邊沿，若干月為晝又若干月為夜，僅數晝夜即等於我們一年的人們，大概也是跟着我們一樣過年的罷？不用說，我們這里所有關於過年的感想以及我們舊文學中一切與「年」有關的詞藻，在他們那邊，是完全不適用了。

有時也覺得，「年」一定要「過」，亦未免無聊；而且會有感想，也是太公式了罷？但你的

周圍既在過年，而且過的鬧烘烘，而且你又在這時油然有感的「傳統」，那麼，就隨牠感一下罷！新的希望如何？新的計劃又如何？自然應該有，可是當你明知道世事的變革，決不像冬去春來那樣簡單而必然，你亦總不免有點爽然自失罷？於是會覺得善頌善禱近於自解嘲，於是除了原則上確信其無可置疑，比如人類社會總是在向前發展，雖則走的是迂迴曲折的路，光明終將戰勝黑暗，真理總必克服偏見，武斷，盲從——等等的大關節目，其他一切人事變化，你便將想得更實際些罷？於是，也許不但前望，且要後顧。而且將以過去的經驗來訂正你未來的推測；於是，感想之中將有不少回憶的成份了。

抗戰以來，過了五個年了，眼前又是第六個。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抱着極大熱望的人們，在這多事多難的五個年頭，每年過年的感想大概是各不相同的罷？今年也許是樂觀成份最多的一年，然而誰又敢無條件的一味樂觀呢？回憶一下也許是有益的。回憶能使我們深思，而且，這五年的種種，但凡是有心人，回憶時總不能不戰慄，不能不低聲嘆道：今天我們抗戰到底是抗定了，日寇之必敗也是定了的了，然而我們之有今日，一方面看，雖似必然，另一方面看，又何其艱險，何其微倖！歷史上空白的一頁（這是自今以後的一頁）正待我們去寫，但是我們不是在空白的歷史上落筆，所以過去的陰影會掩蔽了想像中未來的光明，人生是不斷的鬥爭，擺在我們前面的

，還有無數的艱苦的鬥爭。

在這樣的大時代中，個人的生活變遷，實無足道，但我們既生活在這時代，亦可以從個人的遭遇中看出時代的幾分之幾的歷程。即以過年而論，五年來，不，連現在算應是六年，個人沒有接連在一個地方度過兩個年頭。因此，回憶的感想，也就複雜得很。然而，我自覺得儘管天南地北過了五個年，時代輪轉快慢的脈搏還是對我起了作用。二十六年新歷年我剛從上海到了香港，舊歷年在長沙，那時南京失陷不久，敵人氣焰正盛，然而武漢的新氣象給人們以鼓舞，尤其是年青人覺得一身是勁。二十七年新歷年我剛從香港到昆明，其時汪逆叛國，中央正宣布其罪狀，抗戰陣營的整飭也給人以興奮；舊歷年在蘭州，那時蘭州正開始成爲對外交通的重要樞紐，那時滇越鐵路的運輸能力有限，而滇緬路尙未完工。二十八年新舊歷年都在迪化，這又是迪化的多事之年，而大後方亦正多事。二十九年新舊年都在重慶。三十年的新歷年在淪陷後的香港，我們正從一家被日寇徵用的旅館搬到另一家，正看着對海九龍倉庫的火焰尙未熄滅，舊歷年却在敵人退出僅五六天的蕪陽，我們在船上，準備到老隆。眼前這新舊兩個年頭，大概又要在重慶過了，這算是抗戰以來第一次在同一地方又過了個年頭。

現在正當世界大戰的轉捩點。自然而然的結論，又是中國抗戰的轉捩點。有不少人大概預計

自己明年在自己家鄉過年了，雖然「不要無條件樂觀」的警戒時有所聞。在家鄉過年是可喜的，然而尤其可喜的，應當是中國有進步。我相信我們一定要有進步，我們已經到了不能不有進步的時候，世界局勢的發展要求我們不能不朝進步的方向走，國內情勢的發展也要求我們不能不努力再求進步。現在我們真是所謂「得道多助」，就是自己再懶一點，日寇之必被打敗，好像沒有疑問；但抗戰完了，還須建國，所以不能自己就此滿足。這樣的警惕，似乎天天在報上都能看到，然而我倒正怕因為天天在說，結果只不過是一句話；我們的長處是會看，也會說，而且說得頭頭是道。

誰也不會相信時辰鐘在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間鏗鏘敲了十二下以後，新年來了，便有什麼不同，魔術似的萬象更新了。但是，誰又不能不感情地把好的希望寄托在一年之首？世事流轉，新的早在舊的胎體中萌芽，分年而寄希望，原也不過習尚如此，姑且這樣想；倘反過來看，從已經過去了的，現在還存在着的，亦就可以推斷新年以後的「新」將竟怎樣；但無論如何，對於將來失了信心的人，我總懷疑他怎麼還有興趣在這生活高漲的時候一天一天活着。我不大相信美滿的世界一天可以實現，但我却相信一個人一念之轉未必不能一天做到，這念頭就是從此不要再醉生夢死那樣過日子了。第六年的戰爭的砲火不知能够驚醒幾多這樣的人呢？誰也不敢說

，然而也不能不希望。

我們住在北半球的人們遲早總能跟着地球的公轉過一個年罷？遲早我們可以高呼：寒冬已去，春天來了罷？不要像南半球的人們那樣過年才好。

「七七」感言

最初，大家心目中的戰時生活一定是興奮，緊張，刻苦，嚴肅，而且人與人之間也一定更親切。這一次的戰爭是我們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戰爭，我們歷史上找不出一個在規模上在性質上可以比擬並論的先例，因而當然的，我們的戰時生活也理應是史無前例的。

現代戰爭，一個士兵在前方作戰，得有五個人在後方生產，我們軍隊的裝備較差，那麼算牠至少也該有三個人在後方生產；所以，前方緊張的時候後方要緊張，固不用說，而當前方相持，相當平靜的時候，後方還是要那樣緊張。這緊張，不但表現在軍火糧食等等的生產上，還應表現在一般的社會的風氣，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戰時物資大量消耗，而且一切爲了前線，所以刻苦是當然的。大敵當前，大家只有一個目的，人與人之間自然倍加親切。這一些的認識當敵人在盧溝橋射出第一彈的時候，原是大家都已有了的，所以自然而然想到此後的戰時生活一定是緊張，刻苦，而且人與人之間更加親切，並且大家是這樣確信的。淞滬會戰的三個月，上海市民那種興奮，那種熱烈，至今思之，猶令人鼓舞。記得曾有這樣的關於電影院營業的意見：後方人民應該

無此閒逸心情去看電影，但前方將士應當有娛樂，電影須到前方去演映給士兵看。這話，看似太偏激，可實在是那時熱情瀟灑的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即使在疲倦之時亦願有娛樂來調劑，但感情上已經覺得在「大光明」的軟椅上，看那時的好萊塢片子實不是那麼一回味兒了。

自然，那時候上海市民那種緊張的生活和興奮的情緒，希望牠會普遍於後方一切城市，也許是過高的要求，而且人到底是人，戰爭長期化以後，人的神經可不能老是這樣興奮緊張，那會受不住的。所以後來後方各城市一些娛樂設備也逐漸恢復了。但無論如何，緊張，嚴肅，刻苦，親切，總該是戰時生活的原則。

現在抗戰進入了第七個年頭。嚴格的守着這戰時生活原則的，自然是大多數的人民，可是毋庸諱言，那股勁兒是差了，自發的精神是差了，至於都市中一般的「太平」空氣，則毋庸諱言，離開戰時生活的原則相當遠。因為生活費用一天一天高，大多數人爲了生活，心情是「緊張」的，也不能不「刻苦」了，然而嚴肅熱烈的勁兒是够了；後方的脈搏也還跟着前方跳動，但動態是不同的：前方緊張，後方恐慌，前方平靜，後方鬆弛。另外又加一點幻想：現在是有英美盟邦一同作戰，所以最後勝利可坐而待之。這一種相當普遍的鬆懈和廉價的「樂觀」，在目前即使還未到很嚴重的程度，至少是天天在增加其嚴重性的。

在社會的中上層，另一種心情也時時有之。因為看的方面廣，看的深，知道在最後勝利未到以前，我們還有許多困難要待克服，還有許多新的困難隨時會生產，千頭萬緒，好像不可爬梳似的，知道英美盟邦對於日寇還不能立刻發動巨大的攻勢，敵人的強大壓力還只是我們一肩擔承；於是而焦灼，甚或苦悶，這一種心情，在社會中間階層的知識份子或事業界，恐怕最易滋生。我們誇大了來看，固然不對，但也不應無視。今年春間有一位朋友從上海來，他剛來的時候。認為兩年之內抗戰可以結束，但過了一個春天，他的看法就從兩年而至三五年，並且他那股勁兒差了許多。這又是上述兩種心情先後見於一身，這雖然未可執以概括，但也值得我們研究而深思的罷？

然而這一些，應該是早在意料之中。我們沒有理由悲觀。在長期戰爭中，民族經受着空前的鍛鍊，如果始終沒有那樣的心情上的波動，那是太理想的事。民族的潛力是偉大的，我們已經度過了艱難困苦的六年，便一定也能度過同樣或更艱難困苦的以後的若干年。只有一點必須要做：正視現實，不憚不矜，緊張，嚴肅，刻苦，——再加上熱烈，鼓舞人心，提高情緒。我們要用筆用舌把戰爭初年的興奮充揚的熱情再度在廣大的國土上燃燒起來！六年以前，我們懷着一個進入新時代的莊嚴而快樂的心情，接受了抗戰的炮火，現在我們則以百倍莊嚴而快樂的心情，再加以

百倍的艱勉惕厲，來迎受這新時代誕生前的陣痛，用我們堅決的意志，火熾的感情，迎頭擊退那些鬆懈，萎靡，消沉，奢侈的不祥之風！

一九四三年六月廿四日

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

辛亥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州府中學讀書。校長是沈譜琴先生，但那半年，由錢念劬（恂）先生來代了。於暑假以前，不知從那里傳來的剪辮運動也波及到這個中學校。同學之中剪去了兩三對辮子。爲什麼是「對」呢？因爲那時辮子的剪掉是兩人一對以「你剪我也剪」的比賽或打賭的方式完成了的，所以不剪則已，剪必成對。

那時我們並未嘗聞革命大義。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轟轟烈烈的幾次失敗的起義，我們都不知道。國文教員要是喜歡古文的，就教我們古文；喜歡骯髒的，就教骯髒。我們對於「國家大事」，實在知道的很少很少。但是對於辮子的感情却不好，我們都知道這是「做奴隸的標幟」。因此，倘有一人對另一同學一下戰書一說：「你若剪掉，我也剪」，那位被挑戰的人便也毅然答道：「你敢剪，難道我不敢剪麼？」於是在兩方都不肯示弱，都不肯自認甘爲奴隸的相持局面下，兩條辮子就同時剪掉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各中學的剪辮子風潮，大概就是下半年革命高潮到來的前奏罷。

那年暑假後，我就轉入嘉興府中學讀書了。

興府中學的校長是方青箱先生，教員中間有好幾位是「革命黨」。新剪辮子的同學也比湖州中學多了幾個，而尤以我所在的三年級爲最多。舊時五年制的中學校內，往往以三年級生爲最「鬧事」，似乎剪辮子也不能不首推三年級了。可是嘉興府中學的同學也是未聞革命大義的，教員雖多「革命黨」，可是有的是教幾何的，有的是教代數的，理化的。我們對於朱希祖先生所教的周官考工記，以及阮元的車制考，實在感到頭痛，對於馬幼漁先生的左氏春秋傳，也不大起勁，而且因爲幾何代數程度特別提高，差不多全副精力都對付這兩門功課去了。

以我所經歷過的三個中學而言（最後我還進過杭州的安定中學），那時的嘉興府中學校算是民主空氣最濃厚的，師生之間，下了課堂便時常談談笑笑，有時亦上衙吃點心，飲茶。那年中秋，我們三年級的幾個同學，便買了些水菓月餅醬鴨薰魚還有酒，打算請三位相熟的教員共同在校中洋台上賞月。不料一位教幾何的先生病了，教代數的先生新婚，自然要在家和新師母賞月，只有一位體操教員賞光。然而我們還是玩得很盡興，差不多每個人都喝半醉。

我特別記得這一回事，因爲以後不久，又一件使我們興奮得的事發生了，便是武昌起義。雖然我們那時糊塗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連中國革命運動史的最起碼的常識也沒有

。我們不知道在這以前，有過那些革命的黨派，有過幾次的壯烈的犧牲，甚至連三民主義這名詞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義的消息把我們興奮的不得了。我們無條件的擁護革命，毫無猶豫地相信革命一定會馬上成功。全校同學以自修室爲單位，選派了同學，每天兩三次告假出校，到東門火車站從上海來的旅客手里買當天的上海報，帶回校里貼在牆上。買報的同學常常要上車去向乘客情願。方才買得，可是大家用競賽的精神去幹，好像這也就是從事革命了。

革命軍勝利的消息，我們無條件相信；革命軍挫敗的消息，我們說一定是造謠。

爲什麼我們會那樣盲目深信？我們並不是依據了什麼理論，更不是根據什麼精密研究過的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對比；我們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爲我們自擊身受滿清政治的腐敗，民衆生活的痛苦，使我們深信這樣貧污腐化專橫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順應民衆要求的革命軍。

這一個真理，我將永遠深信！

幾何、代數、考工記、左氏春秋傳、都沒有心思去讀了。成天忙的是等報來、看報。然而可憐得很，我們的常識太缺乏，我們不能從報上看出革命軍發展得怎樣，我們是無條件相信勝利必然是「我們的」罷了。

不久，學校放假。這是臨時假。我們幾個同鄉的一回到家鄉，就居然以深通當前革命情勢的

姿態，逢人亂吹，做起革命黨的義務宣傳來了。雖然是不通火車的鎮，但上海報隔日亦可到。一般的小市民都默認革命黨之成大事已無疑問，然而最擔心者是地方治安。因為，據他們看來，綠營兵老槍二十三名逃了以後，革命軍倘還不來，則土匪之竊發是可慮的。於是辦保衛團之議便漸漸成熟，這倒是真真正正的小市民義勇性質的商團，服裝槍械自備。但後來革命既已成功，這也就解散了。

大概是陰歷十一月中，大局底定，嘉興府中學又重復開學。再到校上課時，老教員已經走了大半，新來一監學又說要整頓校風，師生之間的民主空氣大不如前，終於在寒假大考以後，三年級我們幾個同學還有別級的幾個「不安分」的同學，在校里也起了一次小小革命，——毫無原則，專和那位學監搗亂一場，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從此我們也被革出這嘉興府中學。

這些事情，現在想起來，尚歷歷如在目前，那時我們這些毛頭小伙子，當真淺薄得可笑，然而或許也還幼稚得可愛罷？於今又三十年了，三十年中，舊侶星散，早已音問久斷，然而我相信這三十年中的幾次大變革，當亦是同樣的經過來的罷，自然，各人的感應不能像三十年前那次那樣相同的了。中國的革命是艱苦而冗長的過程，在抗戰第六年的今天來回憶已往的種種，多少烈士的熱血和頭顱，無數千萬民衆的痛苦與犧牲，然後把中華民國的招牌撐到今天，然後把一代一

代的青年教育培養成革命的繼承人，而尤其把這艱苦的抗戰擔到而今，這是辛酸的罷，但只有激起我們的感奮，只有加強我們的信心，我們的爲求民族自由解放的抗戰必得最後的勝利，中國的革命大業最後必得全部完成。

這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有一朝，我們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再作這回憶，我想，這也不會很遠的罷？然而，能以愉快的心情，來熱烈慶祝這大節目的恐怕是我們下一代的兒孫。在我們這一代，恐怕笑顏之下總不免有辛酸。爲的我們是從血泊中來，我們親眼看見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所流的血，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

一九四三年

回憶之類

編輯先生希望我寫點回憶，並且很幽默地說：「不敢以賦得雙十命題。」言外之意我怕不解麼？然而，此時此地，大概還是只能「賦得雙十」而已。

回憶之類，因人而異，亦因時而異，當然更因地而異。現在還不是寫信而有徵的歷史的時候。那麼，即使是回憶罷，恐怕仍舊不免帶一點「賦得」的氣味，而現在三十多年前的那時，中學校裏的我們的一位老師正從「開官考工記」而專門化到「阮元車制考」，把我們追得屎滾屁流，兀自喘不過氣，所以對於國家大事，老實說，就同隔着一層霧似的。不過，當那一聲炸雷打到了我們面前時，童稚之心也會歡喜而鼓舞，也會睜大了驚異的眼睛，凝望着那一「龍戰玄黃」的天地，好像這一切本在意中，要來的總歸要來，而現在是終于來了而已。

對於三十多年前民族史上這一件大事，我之未管流一點汗，——更不用說血了，由此是可想而知的；雖然我也模模糊糊給自己幻想了乃至預許了一個廣闊自由的未來，但正如今天有些「可敬的人物」坐在沙發上看着報紙登出了盟軍昨天進攻卑瑯琉，後天將攻菲列賓而色然以喜，我那

時決不想到自己應該何以自處，我只是篤定心思等候着去拾取我的「戰果」。

結果，等候到了。等候到了什麼呢？除了可以不必再拖辮子以及可以不必再在做國文的時候留心着「儀」字應缺末筆，此外實在什麼也沒有，于是乎我之不免于失望，又是當然的事。但也馬馬虎虎。如果說這一段小小的童年的幻滅對於我也還發生了教訓的意味，那是在十多年以後了，那時「考工記」和「車制考」早已忘得一字不「遺」！

如果這也可算回憶的話，這便是我的「賦得雙十」的回憶。僅此而已。不會流過血流過汗的人有什麼值得回憶？而且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也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大家早已不言而喻。

假若尚有可說的，我想，倒還是三十多年來的寒陋見聞中的若干「典型」的人事。廟是不會動過，菩薩却換過多次。而只認廟不問什麼菩薩的「可敬的人物」也紛紛遂逐，服裝一套一套變換，忙得太可愛，得意忘形得太可憐。這且一筆略過。單說坐在廟裏的罷，青面獠牙，殺氣騰騰的，我們見過；不過下台以後照例總是低眉合十，宛然是個佛徒。當然這是既頗原始，匠之亦不科學。於是而有戴浩然之中，笑臉向人，鬼臉掩住，仁義道德不離口的人兒。但比之背後伸手接「門包」而當面一手假意推拒，滿嘴說「本人最恨此種陋規」，活是民間文藝所創鑄的那個「小丑」的典型的，似乎也還「本色」些兒。可是民衆的智慧雖然創造了那典型，却還不會叫這典型

于既受「門包」之後又發議論，將「陋規」之公行歸罪于老百姓之沒有程度。五十年代的新物事，民間藝術是未嘗夢見的！

從這些地方看來，三十多年來不能不說是有些「進步」的罷？記得前些時間參政之會，有人引明末之「職方多如狗，都督滿街走」，輾致其愾歎；但我則另有感想，我覺得古人實在比我們小氣。譬如魏忠賢，亦不過招搖納賄而已，以我們今日眼光看來，這是何等平常的一件事，然而魏忠賢的門客們給他們這位老板造點生祠，提議請他將來在孔廟吃冷豬頭肉，却就激怒了清議；當時確是「指名」直斥的。並且，三寶太監雖然早已下過西洋，而魏忠賢終于並無番邦可去。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倘以我之童年之同輩，和今日之尚在童年者相比，那進步又是顯然的。今日之童年者，眼界是擴大得多了，頭腦亦未必那樣渾噩，——待要認定這是無量數的辛酸的血淚換來的罷，真叫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悲。但願他們將來所得的，不再是僅僅割掉辮子一條之類。而我相信是不會的。因為時代是不同的了，世界是不同的了，時代在前進，世界在前進，而最主要的，從民族的苦難的血淚中培養出來的他們是不會光坐在那里等待的。

我盼望不久的將來，在這一天，我們都有嶄新的回憶。

一九四四年十月

文協五週年紀念感想

五年前，大概是二月中旬罷，我從長沙到了漢口，目的是呼吸一下那時瀰漫於武漢三鎮的蓬勃緊張的空氣，帶便呢，那時有一家書店找我去編一個期刊，我要和他們當面談談具體的辦法。二月中旬的武漢還是相當的冷，但是只要太陽一出來，便到處蕩漾着融融的春意。

那時候，跟着政府來到武漢的，不但有各機關的公務員，學生，職員，文化人，也有大大小小商店的老板，伙友，以及各行的手藝工人。標明着「南京遷此」或「首都遷此」的酒樓飯館點心鋪裁縫店和理髮室，幾乎每條馬路上都有幾家。天字碼頭輪渡上湧來湧去的賣報童子也都是下江口音，如果和四個月前一比較，武漢當真是換了個樣子。

然而，在這一切以外，將來史家要大書特書的，是這時期的奮發激昂的人心。這時候，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武漢，確是個抗戰的大洪爐，從各方面匯流而來的年青的熱血，在這裏沸騰。這一年的二月初旬，大概是反侵略分會的幾週年紀念會罷，接連十天的擴大宣傳，止轟轟烈烈在武漢舉行，每天有一個羣衆大會，往中山公園去的大路上，排隊赴會的公園接連成了幾里路的長

陣：十字路口，三五人一小隊的，拿傳聲筒，喊着抗戰口號。慰勞傷兵，救濟難民，都在如火如荼進行。

就是在這樣緊張熱烈的空氣中，文藝界的朋友們正在籌劃全國文藝界大團結的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立大會的時候，我已經在廣州；那時廣州也在熱烈舉行黃花園紀念節，接連三夜的十萬人火炬遊行。中國詩壇的詩人們都高擎着火炬，在大隊中，從財政廳前面走到西濠口，火炬的煤煙，薰黑了他們的面孔。

這都是五年前的事了。民族的神聖的抗戰賴有全國軍民的英勇流血，艱難辛苦地支撐了五年，而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也艱難辛苦的支撐了五年，幾位負實際責任的朋友雖不會流血，汗確是流了不少，而且，頭也是磕了不少罷？

大約是半年以前，有一位老實的青年問我道：文協計劃得有什麼工作？文協是否要負起責任？領導全國作家更加積極擁護抗戰建國，在偉大的抗建過程中更加發揮文藝的力量？文協是不是負有領導全國文藝運動的責任？文協的中心工作應該是什麼？……文協將如何保障作家的權益，如何幫助青年作家！物質上和精神上？

這一位年青的朋友不過是無數年青人中間的一個，他們懷着同樣的意見，同樣的問題：從這些意見，這些問題中，我們看見了他們對於文協的無窮的期望。而且，他們大概也知道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是怎樣一句話，但是，他們的深切的期望之心還是不會冷卻。這是年青人的優勁兒罷？我想他們是不承認的。他們有理由這樣設想，因為文協是一切擁護抗建國策的文藝家的組織，文協是精神的力量，對於這樣一個不問文藝上主張如何，不問政治上屬於何黨何派，而在擁護抗建的共同點上結合起來的作家團體，難道不應當寄以深切的期望？這就是無數純潔熱情的青年的看法。

我又聽見有些同仁對於文協的批評。憤憤然，說文協毫無作為，結論成爲「因此我冷淡了」的自辯的，這是一種。認爲這本來是一個空架子，讓它擺着就算了，這又是另一種。記得文協在過去還做過一點事，因而期望它在環境許可下仍然有一份力做一份事，這又是一種。承認文協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而且不可能不必要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因而所謂領導者不是組織上的領導，而是精神上的領導；護持正氣，砥礪節操，願全國作家相勉先做一個正直的胸襟闊大的人，發揚中國文人傳統的美德，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不盲從，不輕信，亦不輕易改變其所信；這是第四種看法。

我想上述後兩種都很合乎實事求是的精神，而最後一種尤中肯綮。文協之產生就昭示了全國的作家在民族至上，抗敵第一的共同點上謀廣泛的聯合，文協之存在就表示着這一種精神的持續，而文協還要繼續支撐下去，就不能不求這一種精神的更加發揚。

這一種精神的發揚，消極的表現是大家客客氣氣，互相尊重，但積極的表現應是誠懇地互相督促，坦白地交換意見。我們多是關心着民族的將來，關心着人民的幸福和痛苦，關心着青年一代的苦悶和磨折，關心着社會道德的墮落，風氣的敗壞的，即使我們在文藝的某些問題上意見不能一致，但我們對於人生社會方面總都是一致的：熱愛光明與真理，希望善的勢力擴大；我相信在這大問題上全國的作家將更加接近，屹然守正，成爲一種精神力量，在青年的一代中樹立風氣。我們還須要比從前更親切地實行互助，——物質上和精神上，生活這付担子的重量一天天的增加，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苦悶也在一天一天增加；在這樣的境地中，一個感情熱烈而清白自持的作家如果感得自己是塊然獨處，沒有朋友，沒有同情，他真會發瘋自殺。

誠懇的互相督促，坦白地交換意見，熱誠的互助，——這是全國作家們更團結得密切些的精神基礎，而文協就是這一基礎上的一面旗。已經艱辛地支撐了五年的文協，希望它從此以後這精神基礎更加堅強，這就是它的比什麼都寶貴的成就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如何把工作做好

爲「文協」六週年紀念作

有一種常常聽到的話：抗戰時期，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得很，文藝題材，俯拾即是。

當然，這話是不錯的。抗戰初期盛極一時的「報告文學」幾乎全都是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然而比起那時候每日在發生的事實來，這又不過九牛之一毛。不知有多少的可歌可泣者，還沒有形之筆墨，文藝工作者只要俯身去拾，一輩子也就寫不完了。

但是爲什麼寫作者近來常常感到題材之窘呢？一個現成的回答是：生活實感不夠。

這當然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現在各戰區幾乎不見有多少作家了，作家們都回到了大後方，而大後方則是嗅不到火藥味却一方面是「紙醉金迷」一方面是掙扎於饑餓線上的地方。紙醉金迷者歌，掙扎於饑餓線上者泣，可是都不壯烈，雖可俯拾，其不合用，自不待言了。

於是乎勢必引出這樣的結論：文藝工作者在這大時代中雖然還守住崗位，（改業的人可說

是少到不會成爲問題），可並沒完成任務。

文藝工作者不敢自誇業已完成了什麼任務。他們自己知道，他們雖則主觀上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客觀上却遠落於現實要求之後。不過文藝工作者之勞而無功，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即以不曾充分寫出可歌可泣的壯烈故事一端而言，其原因亦頗耐研究。我們先從事實來看。爲什麼抗戰初期盛極一時的「報告文學」後來漸漸消歇了呢？理論家的說明現在姑且擱開，光是出版家的帳簿就告訴你：即使寫的仍然那麼盛，出版者却不那麼踴躍，因爲銷路遲鈍。在這裏，我們倒也不能專罵出版商的市儉主義。只要他們還是願意出版有益於抗戰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因爲他們不願意專出「報告文學」而過份責備。問題是在這些可歌可泣的內容的「報告文學」爲什麼不能長久受到讀者的歡迎？這裏，又有一個現成的答案：爲的是千篇一律，所以讀者久而生厭了。所謂千篇一律，當然指內容。怎麼，在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的抗戰中難道廣大的讀者羣就對於壯烈的故事厭倦了麼？這是不可思議的，而且也是遠於事實的。

事實上，並不是厭倦了壯烈的故事，（當然亦即不是對於抗戰缺少了關心），而是僅僅壯烈的故事不能滿足他們對於抗戰現實渴求了解的熱忱。隨着抗戰的發展，社會生活起了劇烈的動盪和變化，新的問題不斷發生，而這些問題又直接間接都要影響到抗戰。人們所要求於文藝作品者

已不僅爲能反映這些現象，且要求能給以解答。這樣的要求，反映在文藝作品的銷路上，就是長篇比短篇更受人歡迎，而描寫複雜的社會生活的，也比單純的壯烈故事更能引人注意。

努力去滿足這樣的要求，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然而如何方能負起這責任來呢？在作家方面，必須加深他的修養，豐富他的生活，而在另一方面，必須給作家以更大的創作的自由，作家在題材上所受的限制和社會的要求如果相差太遠，則文藝之花勢必枯萎，文藝即不能負起時代的使命。

抗戰今已進入最後亦即最艱苦的階段，振奮人心，追求最後的勝利，當然是文藝工作的唯一目標，這已是天經地義。然而事實告訴我們，要單靠前線的壯烈故事以求達到這一目的，在今天已覺不夠，爲什麼呢？因爲抗戰的現實，已經太複雜了，社會的要求已經提高到如此地步，文藝工作者如果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碰壁是難免的。

歸根一句話：如何把工作做好，作家們自身固須努力，然而也得給以更大更多的創作的自由。

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

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

紀念文協七周年暨第一屆「五四」文藝節

今年我們是在「五四」這紀念日慶祝我們的文藝節了。「五四」作為文藝節，這表示承認了「五四」這紀念日。新文藝運動二十五年來無可否認的成就，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這一個節日定的也還恰當；然而「五四」可以標示文藝的新生，文藝的新生實質未足包括「五四」運動的一切內容。如果狹義的地只把「五四」看作一個文藝運動，或者甚至於當作一個「白話文學」運動來看，那就是縮小了「五四」的意義，同時也就會模糊了新文藝運動的精神和使命。這是不可以辯明的。

「五四」是思想運動，也是羣衆性的政治運動。三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八十年來的喪權失地，當時北京政府的頑固腐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呼聲，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人民政權的建立，中國民族工業幼芽的茁長，民族資產階級雛體的形成，——這一切因素，匯成了「五四」這一聲春雷，這一股奔騰澎湃的潮流。「五四」的大口號，民主與科學，是根據了現實的要

求而產生的。兩個口號雖然並列，但是二十五年來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先決條件是政治上的民主。

從歷史上看，一種新的文藝運動必然來源於新的思想運動，而同時又爲其先驅。中國的新文藝運動也不是例外。民主與科學，是新文藝精神之所在，同時，發揚民主與科學也就是新文藝的使命。而民主與科學表現在文藝思潮上的，我們稱之爲「現實主義」。

我們的新文藝的傳統就是這個現實主義。反對獨斷與武斷，反對偏見與成見，反對誇誇張張局部而抹煞或歪曲全體，反對只許頌揚，不許批評，反對掩耳盜鈴的虛偽粉飾，反對那只看見今天不看見明天的近視眼，反對無所容心的冷觀態度，——這便是現實主義文藝的科學精神；面向民衆，爲民衆，做民衆的先生，同時又做民衆的學生，認識民衆的力量，表現民衆的要求，——這便是現實主義文藝的民主精神。二十五年來，我們的新文藝是在不斷的自我批判中以求保持這現實主義的傳統，以獲得更多更大的成就的。然而現實阻礙了整個民族文化發展，對於新文藝運動的阻力也很大。寫作的自由，乃至文藝寫作者人身的自由，也還沒有保障；復古的逆流，不會停歇過，有些學校公然禁止學生閱讀新文藝，違犯者即被開除，有些地方見了文藝書刊不分皂白一律沒收。

不民主，中國就沒有前途。文藝應當配合着今天的民主運動。而要在這大時代中擔當起本身的任務，文藝界應當加強自我檢討：對於民衆的認識是不是充分？有沒有站在民衆之上或站在民衆之外的非民衆立場的觀點？如何更能接近民衆？如何虛心學習，從民衆的活的語言中汲取新的血液以補救蒼白生硬的知識份子的「白話文」？如何批判地運用和改進民間形式？如何掌握民間形式而真正實現「文藝下鄉」？如何挹取民間形式的精英作爲創造民族形式的一個原素？只有在這樣加強自我檢討的過程中，新文藝方能更益壯大，方能普遍而又提高，方能有效地遏止文藝上的反民主的各種黑潮，方能配合當前的民主運動，作新時代的號角！

新文藝今天已進入了成年時期。一向是多災多難的，受慣了風吹雨打，受慣了摧折幽閉，然而終於成年了，腳踏着實地，而向着光明。它的前程是無限的，只要能够堅持一貫的奮鬥不屈的精神，發揚光輝的傳統。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

文藝節的感想

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大局，用一句濫調來形容，就是「驚心動魄」。我們作戰已經八年，到今天，只落得個到處是脫節，然而，却又是勝利逼人來。而對着這樣的矛盾，除了阿Q之流，但凡有點自尊心和責任感的，總不能不變慮反省，以至坐臥不安。

在這普遍脫節之中，我們的文藝運動，也不是例外。有一句老調：「文藝是時代的鏡子」。且不說這一句話多少還應當加一點補充，就把文藝來比作鏡子罷，可憐我們的這面鏡子是不讓隨便照的，要是照到了惡瘡毒瘤，馬上就會聽到喝止的聲音，一塊紗便蒙上來了。八年以來，年年一度，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要開個年會，這當然不是爲了例行公事，而是要總結一年的經驗，痛切的檢討一番。至少有三個題目應在檢討之例：已經做的是什麼？做得怎樣？未做而應做的是那些？該怎樣去做？客觀的阻礙是什麼？如何排除？然而年復一年，問題是愈積愈多，話却愈來愈少了。而且也不得不愈來愈空泛了。所以然之故，大家心裏都明白，這裏暫且不提也罷。但是社會對於文藝及文藝作家們的關心，實在叫人感奮：這種關心的表現之一就是援助貧病作家的熱烈

。這一點溫暖的友情，對於困厄苦悶的文藝界精神上的鼓勵是不能以物質數量來計算的。

蘇德戰爭爆發後二十二個月，在蘇聯作家大會中，有名的蘇聯作家愛倫堡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幾句話：「現在大家都說戰爭給了作家們以題材，……可是我們作家有什麼給了戰爭呢？」不用說，蘇聯作家是給了不少的。中國作家們委實比不上盟友。但由於所謂「國情不同」罷，中國作家們有力無處使的苦惱，也一言難盡。這且不說，現在也讓我們套用愛倫堡的句子：戰爭給我們題材，我們有什麼給了戰爭呢？社會給我們深厚的同情，我們有什麼給了社會呢？

仍舊先來看看我們的盟國，然後再講自己。表揚前方士兵作戰的英勇和後方人民怎樣努力生產，這是英美蘇的戰時文學的共同點，但是另外也還有一點相同，即該頌揚的固然頌揚了，該批判的也不忌諱暴露。劇本前線就是蘇聯作家勇於批判的典型作品。這部劇本暴露高級指揮人員的缺點，十分嚴厲，倘在別的國家該劇作者說不定會有不測之禍。然而在蘇聯，前線却得了斯大林文藝獎，全國各地，前方後方，都演出這劇本，絕不顧慮會因此滅了自己的威風。事實上，正惟能這樣大無畏地執行自我批判，紅軍是真正愈戰愈強了。在英國，綏靖政策的擁護者，也成爲批判的對象，正如美國的作家會經努力於克服孤立派在人民中間的影響。由此可知，英美蘇的進步的作家們都曾對準了自己國家在爭取勝利途中最大的障礙，痛下針砭，而英美蘇政府也容許這種

批評。這就是三個盟邦的民主作風。

我們作戰八年，現在終於守到勝利逼人來的時期了，但嚴重的問題重重疊疊擺在我們面前的，文藝這面鏡子，到底照出了多少？種種脫節，種種不合理，種種貪污腐化，一切凡為社會人士所痛心疾首，所憂慮焦灼的，在文藝作品中到底反映了幾分之幾呀？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從頭來一番檢討。

抗戰初期，武漢撤退以前，我們的文藝運動，主要的朝着兩個方向：一方面，由於沿江沿海的大都市相繼淪陷，本來聚集在那裏的文藝工作者分散到內地來，文藝工作者從大都市裏的亭子間走到了小縣城和鄉鎮，走到了農村，他們更加靠近民衆，他們的視野擴大了，經驗豐富了，而文化落後的內地縣鎮農村也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文藝活動，——抗戰初期在內地各縣出現的無數文藝性的小型刊物乃至街頭壁報，就是明證。另一方面，短篇的「報告文學」盛行一時，無論是大型的刊物或單行本，主要的內容就是這些「報告文學」，而「報告文學」的主要內容又都是前方的小故事，——士兵的勇敢，敵人的殘暴，人民的憎恨。這些「報告」之盛行，自然不是偶然的。那時候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是在前方或至少是在緊接前方的地區，是在部隊裏，是在人民中間，他們那時不是「賣文爲生者」，而是「工作者」，他們耳聞目睹的，是這些壯烈的小故事，他

們還能抽工夫寫出來的也只有這樣「報告」的短篇，而且這樣短篇的「報告」又正適合了當時的客觀需要的。

在今天看來，當時這兩個方向，都沒有錯。我們更應鄭重指出：當時這兩個方向都不是什麼人在那裏計劃提倡出來的，那是滿腔熱血渴欲為祖國服務的極大多數文藝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文藝工作者）適應了那時向前發展的整個形勢，自動的不謀而合的，大家都那樣走，結果造成了方向。凡是能和發展着的形勢取得配合的方向一定就是正確的方向：今天在事後看來，就更加明白。

誠然，那時走進了內地各小縣鄉鎮的文藝工作者也還不能把握着正確的工作方式，主觀主義和都市知識份子的氣氛也還十分濃重。誠然，那時的「報告文學」也還有嚴重的缺點，作者們大都熱情有餘而深入的觀察體驗尚嫌不足，有多少在今日嚴重已極而在那時也早已咄咄逼人的問題也都沒有觸到。但是我們也要記得，從「七七」到武漢撤退，其間不過一年多：總結經驗，改正缺點，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呀！那時的「報告文學」固然不會觸及若干根本問題，但即使是那樣「熱情有餘」的作品，在鼓勵人心這一點上，也不能抹煞它的作用。至於工作方式的缺點，在工作過程中，是可以克服而且一定能夠克服的；事實上到是工作剛開了個頭，而形勢即已日非，文藝

工作者在小縣鄉鎮豈不住身，即或勉強可以存身，工作也做不動了，於是就有了近三兩年來文藝工作者又回到大後方幾個都市來的現象。

如果我們把文藝工作者的走進小縣鄉鎮只看作傳播文藝種子，或在那些落後的地方裝點些文藝空氣，如果我們把「報告文學」的一時盛行看作只為適應當時的需要，或竟視為宣傳工作，那是看得太淺了。我們所以重視此兩者，因為這是代表了一個基本的傾向：深入社會，面向民衆。文藝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都深入社會，面向民衆，這才算我們的文藝運動真能擔負起時代的使命。而「報告文學」這一形式，自亦不失為「深入社會，面向民衆」之一途。說是一途，因為我們還會努力於民間形式之運用。

從「七七」到武漢失守，抗戰文藝運動的主潮，略如上所論列。其後，形勢變化，就整個中國而言，大後方和敵後解放區的文藝運動可能發展的條件，完全不同，而工作的重點也有不同。至於大後方呢，在進步的作家羣中，「深入社會，面向民衆」的大原則依然是堅持着的，然而格於現實形勢，工作重點已不能不有所變更。由於文藝工作者之不得不集中於都市，由於出版及上演等等條件之困難，又由於物價高漲，讀者和觀衆的圈子不斷地在縮小，今天大後方文藝運動所能迴旋的餘地，比起抗戰初期來，實在小得多了；而這些客觀條件對於文藝所發生的影響之一就

是顧到了「提高」，犧牲了「普及」，——率直地說，就是工作的對象不得不是城市的讀者和觀衆。而大型作品之流行，和這也有一部分的關係。

然而限制了大後方文藝運動的尙不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歷史告訴我們：沒有自由的空氣，文藝是不能發皇的。聽不到人民呼聲的專制皇朝只能產生奴才文藝。禁忌太多，統制太嚴，視批評爲叛逆，以阿諛爲忠誠，結果一定窒息了文藝。最近幾年來，有一個最大的矛盾，人人都能看到：戰爭給作家以題材，但作家搔首躊躇，有無處落筆之苦；社會渴望作家拿出些切實反映了人民要求的作品，但作家唯有報以無可奈何的苦笑。廣大的讀者觀衆絕對不是「秦如豕鹿」，現實生活在他們心裏積起了大堆的問題，他們要得一個「爲什麼，該怎樣」的解答，他們希望在書本裏在舞台上看到他們心中的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他們唾棄那些粉飾頌揚，寬皮窄肉的奉命文學。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人民心中自有其天平，作家筆下亦自有其繩墨，一句話來說：該讚美的自然要讚美，該批判的亦不能不批判。然而這樣一個簡單合理原則，作家們爭之亦既多年，到如今還沒有得到。

另一方面，一些麻醉人心，歪曲現實，助長僥倖心理，鼓勵奸詐豪強的作品，却公然流行，未受制裁。色情文學已經赤裸裸到連「抗戰」的面具也不戴了，而既戴面具，又有色情，甚而還

有所謂「悲壯場面」以頌揚特工爲主眼的所謂閻樓文學，爲害尤大。歷史又曾告訴我們：凡在文藝寫作不自由的時代，享有自由的一定是這些頹廢的顯到黑白的帶有濃重欺騙性的作品。

說起來也許覺得話太重了些，可是實在今天的文藝運動正站在十字路口。時勢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急迫了，文藝必須配合整個的民主潮流，「深入社會，面向人民」，表現人民的喜怒哀愛憎，說出人民心坎裏的話語。文藝工作者工作的對象不能不從城市讀者觀衆羣的小天地擴展開去，這是爲了擴大影響，同時也爲了充實自己。客觀的困難和束縛，要努力以求解除，主觀的能力也要努力增強。讓我們在總結經驗，改正錯誤的新起點上，重振抗戰初期文藝運動那種闊大而活潑的作風。世界在前進，中國也不能不前進，中國的文藝運動也一定得前進，只要我們堅持着「深入社會，面向民衆」的大原則，從內容，從形式，克服主觀主義，克服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及好爲艱深新奇的偏向。

一九四五·五月

現在要開始檢討

朋友們隨便閒談，都覺得現在應當來檢討過去八年中文藝工作的成果了。這是一件切要的事務，同時也是一種繁重艱辛的工作。八年的抗戰是我們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這須要長時間的探研，須要展開多方面的討論，更須要各種意見的切磋補充，論辯駁難，然後可能既廣博而又深入，然後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然後能夠真正做到綜結過去經驗而決定今後努力的方針。

我這裏說「決定今後努力的方針」，可並不是反過來說，過去八年中我們沒有努力的方針。八年的抗戰是爲了什麼？我以爲可用兩句話來說明：對外爲揮脫一切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加於我民族之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侵略，對內爲解除封建勢力與買辦階級對人民的壓迫而爭取民主政治。既然抗戰的大目標是這兩項，那末，服務於抗戰的過去八年的文藝活動自然也應當以這兩大目標作爲努力的方針。事實上我們也是這樣做了。現在抗戰雖已結束，而這兩大目標尚未完全達到，那末，今後我們的文藝活動當然要以這兩大目標繼續作爲總的方針了。不過，在個別的文藝問題上，我們即須要綜結過去八年來的經驗，作爲今後繼續努力的基礎。問題是簡

單明瞭的：在配合人民大眾的政治要求上，今後的文藝的任務依然是對外求掙脫任何帝國主義加於我民族之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鎖鏈，對內爲爭取民主，除此兩者而外，暫時應無其他的任務；但在如何更有效地配合人民大眾的政治要求，以反映現實而發揮文藝的力量，那就須要綜結過去的經驗更進一步了。

這是我的看法。這篇小文，企圖不高，只打算就過去八年中文壇上的主要傾向以及若干重大問題，作一簡略的說明，私衷所求不在遽得結論，而在引起商討。自然，既作說明，亦就不能不有個人的見解乃至批判，亦不敢自以爲是，無非是拋磚引玉罷了。

就軍事與政治而言，武漢撤退是一個轉捩點。在這以前，軍事上雖屢有挫折，然而畢竟打了幾個硬仗，民衆運動雖遭遇阻礙，然而總還可以做一點，——一言以蔽之，這時的抗戰情緒，一般是在高漲的。武漢撤退以後可就不同了。在這以後，軍事上沒有什麼大會戰，敵人對我進攻可說是變成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了（這種情形繼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年），而大後方的政治亦從此開始逆轉。貪污滿街，謬論盈庭，民衆運動，備受摧殘，思想統制，言論檢查，無微不至，法令繁多，小民動輒得咎，而神姦巨猾則藉爲護符，一切罪惡都成合法，——在這樣情形之下，抗戰情緒，一般低落，自屬不免。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文藝界的進步力量始終在苦鬥；然而不論如何，消耗在消極抵抗的精力，是比在積極進取方面的要多些。出版檢查之嚴密，禁忌之多，使得作家們的寫作自由完全被剝奪，只許歌頌，不許暴露的官方文藝政策，給作家們在下列二途選擇其一：如果不願閉目扯謊，那就只有迴避現實。當然還有第三條路，那就是擱筆。但是，繼承了「五四」以來的優秀傳統，在十年內戰時代飽經鍛鍊的中國作家們是懂得怎樣作鬥爭的。大概說來，這向三方面發展，後來成爲三種主要傾向。第一種：與其不痛不癢反映最小限度的現實，不知乾脆不寫，轉而寫些最有現實意味，足以借古諷今的歷史題材。第二種：既然對於大後方和正面戰場的現實沒有寫作的自由，那就寫敵後遊擊區，寫淪陷區，乃至「陰陽界」；既然不許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惡，那就只好寫「小城風波」，寫鄉村土劣，寫知識份子的苦悶脆弱。第三種：與第一種用心略同而意義則純爲守勢的，則爲介紹世界古典名著；這彷彿是：既然不是上陣廝殺的時候，姑且研習兵法，擦拭武器吧。自從武漢撤退以後，直到抗戰結束，我們的文藝活動，我以爲大致如此。

顯而易見，武漢撤退以後的文藝工作較之以前的，頗有不同。在這以前，由於環境較佳，文藝作品反映現實的自由多些，但缺點是熱烈有餘而深刻不夠，尤其是僅僅吶喊抗戰，未曾反映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毛病極大。此一時期的優點是迅速而直接地反映現實，與抗戰的迫切要求相

配合。這一個優點，後來在大後方由於政治逆轉而不可能繼續發揚了。但在敵後解放區這却能發揚光大，而且糾正了它的「未曾反映人民的民主要求」的毛病。不過，解放區的軍事鬥爭的頻繁艱苦，以及物質條件的困難，也大大限制了它的發展和成就。這也是無庸諱言的。

至於上述的大後方三種傾向，在嚴厲的檢查制度之下，也不能有正常的發展，即使是歷史題材，也逃不過檢查的網，「屈原」在第一度演出以後，即不能演了，而「高漸離」則始終不准上演。寫敵後的作品只能把背景放到遙遠的「白山黑水」之間，且亦不能不有所諱；寫淪陷區則要拖一條人心思「漢」的尾巴，而且不得不抹煞了民衆自動抗日的事實；寫鄉村土劣有時還不得不用個「清官」來陪襯一下，甚至世界古典名著的介紹也不是完全享有自由的，西歐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就遭到過留難，「鐵流」曾被禁止。諸如此類的事實都說明了即使不是直接反應現實的作品，也受到壓迫，而最令人啼笑皆非者，乃是禁令措詞竟有「與抗戰無關，毋庸出版」，或「不合抗戰要求」等等理由。

與抗戰「有關」或「無關」，檢查官的解釋當然和作家的不會相同。就理論上說來，凡能推動民族精神使前進，凡與發揚民主精神有直接或間接裨益的，應當都看做與抗戰有關，而且合乎於抗戰的要求。但事實上，並不合乎上述理論的作品，卻沒有受到「無關」或「不合乎抗戰要求

」的批駁。這中間就有若干時髦的作品，世界「名著」的翻譯，乃至全為書賈生意眼所支配的色情作品。一年以前，當物價日日高漲，讀者購買力大見低落之時，大批的色情作品泛濫於書市場，而這些東西全是經審查通過的啊！

然而必須指出的，也還有一種表面上與抗戰「有關」，而實際則是有毒的作品；這就是誇張「特工」的作用而又穿插了桃色糾紛的東西，理論上，在淪陷區作「特工」——對敵的各種工作，如組織地下活動，搜羅情報，破壞敵人機構等等——的人物及其活動，亦未始不可描寫；但應當從有民衆掩護，民衆組織的背景上去寫「特工」，也只有這樣的「特工」才不是牛鬼蛇神的兩面人，才有意義。可是我們所見的這一類作品却並不如此。它們把「特工」人員寫成黃天霸，白玉堂一類，而又誇張其所謂「锄奸」的作用，對於淪陷區民衆的抗敵活動却避而不談，這就不但歪曲了現實，而且暗示給讀者，抵抗只要有「特工」就成了，不需要組織民衆，發動民衆。這樣的作品，儘管與抗戰有關，然而是有毒的，且正惟其表面上「有關」，故其爲害不在色情作品之下。

此外，掛抗戰之羊頭，賣法西斯的狗肉，戴「民族的」面具，作封建勢力的幫兇，擺起面孔痛言「人民程度之不够」而對於官吏之營私枉法則熟視無睹，甚至以政治機構之腐敗歸咎於社會

之無組織、而同時則力言人民組織必須在貪污枉法者包辦之下，對民族工業的崩潰巧爲掩飾而大發其將來如何工業化之夢囈，對農民所忍受的封建剝削認爲此時此際所應有，而同時則大開其「耕者有其田」的空頭支票：凡此種種反民主反人民的虛偽的歪曲的言論雖不盡以文藝的形式出現，但其欺騙麻醉作用亦相當強烈。

上文所述，可說是十分簡略，但由此已可想見文藝界進步的民主的力量如何陷於雙層的夾攻而艱辛萬狀了。應當承認，文藝界進步的民主力量自始即堅持思想鬥爭的原則，然而亦應當承認，由於客觀阻礙者半，而由於主觀努力之未充分者亦半，思想鬥爭的進程中缺點很多。在那時的情勢之下，鬥爭時或不得不紆迴曲折，甚至遷就事實，但取捨之間分寸稍一失當，即易流爲無原則的妥協，在題材上迴避現實，在立場上表示動搖。這也是不必諱言的事實，八年來的文藝工作中隨處可見，固不待一一舉例的。前面也已提到過，武漢撤退以前，我們的文藝作品歌頌了人民的英勇，但是沒有喊出人民的民主要求，因而不能視爲善盡任務；現在我們又可以說，武漢撤退以後的抗戰文藝即使能够更多地暴露政治上社會上的黑暗，（這是事實上沒有做到的），但若不能充份反應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則依然不能不被譏爲迴避現實與立場動搖。試虛心自問，八年來我們的作品有多少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不幸是既少而又微弱。倘從這一點來看，我們

即使說過去八年來的文藝工作主要毛病是右傾，大概也不算過份吧？

而造成此錯誤的所以然之故，就如上所述，一半是由於環境惡劣，一半亦由於主觀努力的不足。

不但過去的八年，即在今後較長一個時期，我們文藝的首要任務必為配合廣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認定了此一中心任務，然後我們過去曾經熱烈討論過的一些問題如深入民間，如大眾化，如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相因相成……等等，方可得到正確的理解。而在檢討過去的工作時，以為也須以能否配合人民的民主要求為準則。自然，這只是我的見解。真理越鑽研而愈明，這篇小文極不完備，錯誤必多，希望能引起同人們的討論，那就不勝榮幸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寫於無陽光室，重慶。

爲詩人們打氣

抗戰八年中間，我們的文藝運動，毋庸諱言，在許多方面都還做的不夠。一般的說來，我們的文藝工作都還趕不上時代的要求。抗戰初年，我們的文藝各部門的工作曾經蓬勃一時，文藝工作者從大都市走進了荒僻的縣鎮鄉村，開始接觸了廣大的人民，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形式都陸續在產生：這是好的方面。但是，不可諱言，這時雖熱情有餘，而深刻不夠，創造的精神雖頗發皇，而認識現實，把握現實的功夫却還不足。即以「深入社會」一端而言，這時的文藝工作者雖然已經跳出「亭子間」，走進人民羣中，可是亦不過走進而已，和人民的接觸還是表面的，還是在人民中間作客，及至武漢撤退以後，政治形勢逆轉，文藝運動在各方面遭到阻礙和迫害，文藝工作者連和人民表面接觸的可能也沒有了，寫作不自由，演出不自由，此中情況，文藝界同人回想起來猶有餘痛。結果是蓬勃一時的文藝運動消沉下去了，作家們促偏于二三後方都市，呻吟于生活重壓之下，思有所寫作而動輒觸犯禁忌，思欲深入社會以充實生活，則障礙重重，處處遇鬼打牆。這都是迫使文藝工作落在時代後面的客觀的原因。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主觀努力的不够強。如果不肯承認主觀努力不够，而把一切責任歸之于客觀環境，這便是不肯虛心，便不是我們應有的作風。我們是需要嚴厲的自我批判的，我們不諱言缺點。我們主觀努力不够之處，不止一端，而其中之一就是未能堅持大衆化的方向。

爲了自我批判，恕我借用一個朋友對於抗戰初期文藝工作所下的一個按語，這是八個字：轟轟烈烈，空空洞洞。這八個字也許有些同人們覺得嚴厲一點，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至于武漢撤退以後直到歐戰結束這長時期的文藝工作，則我打算用另外八個大字以代批判：這就是躲躲閃閃，勞而無功。這八個大字當然也是嚴厲一點，但我以爲嚴于責己，也不是壞事。

然而我們倘遂以爲抗戰八年中間的文藝工作一無可取，這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八年中間我們果真一無所得麼？絕對不是。八年中間我們是有所得的，而此所謂「有所得」，還不是指個別作品而言，這指的是寶貴的經驗教訓，特別是那些新的工作方式的探討以及新的作風的嘗試。自然，我們也應當承認，在運動方面的這些新的工作方式有的只開了個頭，有的則在工作過程中發見了錯誤而尙未能或未及克服，在個別作品方面的這些新的作風或尙成果未睹，或竟淺嘗輒止，或徘徊躊躇而方向不堅定，但無論如何，這許多的經驗是寶貴的，這勇敢的創造的精神是應當珍視的，——這給我們今後的工作以重大的啓示。而在若干問題上，例如怎樣改造自己，深入社會

，例如文藝通訊運動，例如運用舊形式，例如大衆化，等等，我們如果不珍視這些過去的經驗而把它作爲繼續發展的基礎，那便是不可恕的愚蠢和不可恕的錯誤。

在詩歌方面，同樣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

八年來的詩歌工作做得怎樣？我的這篇短文中並不打算討論。我自知現在我還沒有這能力來討論。八年來的詩歌工作比起文藝其他部門來是強些呢或是弱些？也不是本文所想像。在這裏我要指出來的，只是這一件事：八年來我們的詩人們確是縱橫馳騁，大胆地作着一切新的嘗試。他們大胆地作了朗誦運動，大胆地作了街頭詩運動，大胆地採用了民謠的風格，大胆地寫長詩，——數千行的敘事詩，大胆地要把文藝各部門中一向是最貴族的這一部門首先換裝而吵嚷地擠進泥腿草鞋的羣中。

他們的成就如何，此處姑置不論；但他們這種大胆地嘗試，勇敢地創造的精神，我們一定要珍視，一定要讚美。如果「五四」時期的白話詩是對於舊體詩的解放運動，那麼，抗戰時期的詩歌運動便可說是對於白話詩的再解放，而這一解放運動，儘管是瑕瑜互見，但就其最主要的項目而言，都是緊緊抓住了大衆化的方向的，不嫌說得誇張，這正爲我們今日的民主運動時期的人民的歌手作了先驅。

在這里，我打算就「詩」與「歌」之分別說幾句門外漢的話。

「詩」與「歌」當然是孿生兄弟，但孿生兄弟儘管面目相似，到底是兩個人，將來也許一個學了文，另一個就了武，我們沒有理由硬叫他們一個樣。兩者最基本的（也許就是最粗淺的）區別在於詩不爲「被之管弦」而作，而「歌」則恰恰相反，正爲了要「被之管弦」，這才「有作」，儘管有三百篇本皆入樂之說，而唐人的詩據說在當時也曾「被之管弦」，（其實恐怕還是「徒歌」，未作考證，不敢斷定），但就近世而言，詩確不爲入樂而作；詩成後有人拿去譜上音樂，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却認爲「詩」須具有可歌（徒歌）的性能。中國詩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這發展的線索該用什麼來解釋呢？我想似乎可以用力求具備可歌的性能來解釋，也勉強可通罷？當然，中國舊詩的發展的規律如何，我們今天大可不管它，但是，我們今天既要求詩擠進泥腿草鞋羣中，——換言之，詩成後先要訴之于耳而不是訴之於目，則「可歌的性能」不應不受重視罷？而在這一點上，我就覺得抗戰時期我們的詩人們大胆地採用了民謠的風格，他們的不論是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都是我們今後最足珍貴的參考資料。

在大衆化這條路上賽跑的文藝的各部門，首得錦標者或者將是詩歌罷。這是因爲從抗戰時期的成果看來，覺得它的基礎最厚，即以看來像是最遠離大衆的長詩而言，其實只要寫得好，也

何嘗不能接近大眾且受其歡迎，古來的民間敘事詩，由民間詩人歌誦的，其長有及數千行的呢！

但一切之中最關重要者，還是詩人們充實自己，改造自己的問題。如何深入人民羣中，不作為他們的客，而成爲他們的一員，——這將決定了個別詩人的成敗，也將決定了詩的前途。說句不敬的話，今天我們的新詩惟有兩途：一即大衆化，這預示了輝煌光明的前途，一爲不能跳出小我泥淖，這就預示了鑽進牛角尖的前途。人們說今天的新詩尚未「成年」，——即在形式方面尚未有典範的成熟的規律可循，但我以爲正惟其尚未「成年」，成見少，束縛少，故在大衆化路上與其姊妹們賽跑時它捷足先登的希望最大。

最後再說一句：充實自己，改造自己，消滅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意識情緒，而求與大衆共呼吸，同喜憎哀樂，這是作家們今天的急務，詩人們當然也不是例外。

序「一個人的煩惱」

戰爭的時代，人們的善良的天性會比平時更加輝煌地發展起來，然而同時，貪婪卑劣的人總也會比平時更加肆無忌憚，伺隙橫行，一方面有成仁赴義，視死如歸的匹夫匹婦，另一方面也有借國難以自肥，刀頭上舐血的城狐社鼠。好人更好更苦了，壞人更壞更樂了，但是也有幡然覺悟，在戰爭的烈火中燒淨了污垢的，同時也有被戰爭的艱苦的現實所震懾，以至失却了故我，而畏葸退走的人們。

這一切的升沉轉變的百面圖，在我們這民族解放的抗戰中間，幾乎也是隨時隨地可以看到。這是無情的現實。然而一個有胆有識，敢於正視現實的人，決不會因此而迷惘，因此而沮喪。他知道：善的勢力，儘管在目前看來還不見怎樣雄厚，但牠既然代表了人民大眾的利益，既然和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是合一的，那牠就是有前途的，牠的發展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擋。同時我們又明白：必然要向前發展的善的勢力，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和阻力，甚至有時好像已經絕望，所以再接再厲的鬥爭精神一定不可缺少。

有了這樣認識的人，他事前就不會存着幻想，不會無條件的樂觀，不會隨然自大自負，而事後他也不會小有挫折就垂頭喪氣，不會苦悶，不會自餒，自然更不會退上老路了。

我們對於抗戰有絕對的自信。爲什麼？因爲這是善的正義的自衛的求生存的力量，對於惡的侵略的強暴而不義的力量之反抗。我們確信：善的正義的力量必然能勝利。但是我們也決不取且不應該存僥倖之心，而自醉於廉價的樂觀。爲什麼？因爲我們民族之善的正義的力量增強的過程，中黑暗的罪惡的份子也在潛滋暗長，甚至公然活躍。抗戰的現實，是光和影交織着的。唯有不懈不怠的鬥爭，才能使光明繼續而擴大。盲目的樂觀和盲心的悲觀，都是因爲不能認清現實之故。

小說「一個人的煩惱」就是想從一個青年知識份子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過，來說明凡是不能認清現實，只憑一時的衝動，而且愛以幻想喂養他心靈的人們，將落到怎樣萎靡消沉的地步。劉明當然不是一個壞人，本質上他還不失爲一個好人，然而由於他的好像是狷介却實在是孤癖，尙知自愛却又不至過於自負的毛病，再加以貌似沉着而實則神經過敏，一方面恥於寄食，看不慣泄泄沓沓的生活，蠅營苟且的把戲，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吃苦。真正對民衆虛心，於是他這本質上還好的人就不能進一步把自己鍛鍊成爲堅強的戰士。當抗戰初期，一般人心激昂，情緒高漲的時候，劉明投身於當時一般熱血青年知識份子所趨向的抗戰工作，他不肯在後方吃一口安逸飯，到他

前綫參加了部隊的宣傳工作；但他這一個行動，雖然他自以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其實還是一時的衝動，帶一點幻想，也爲了負氣。在決定這行動之前，他也的確有過所謂考慮，但不幸他考慮的範圍只限於他個人的瑣屑，他生活的小圈子裏所接觸的人與事對他的反應，而未嘗放大眼光對抗戰現實，對他未來生活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難與不盡如意，加以深湛的研究。他對現實是盲目的。在這里，就有了他後來廢然而返，牢騷消沉的根因。

像劉明那樣的青年知識份子，只憑着一腔熱情，一片主觀的幻想，投身於當時的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洪流中，何止千萬呢！像劉明那樣碰了一頭就縮回來的，固然也不少；然而更多的却是在鬥爭的烈火中鍛鍊了身心，在現實的洪流中找見了他自己，蛻去了故我的浮華，出落得更堅強沉毅了。作者沒有從正面寫這些富於積極意義的人物，作者却寫了個從鬥爭中逃陣下來的人物，但雖然如此，劉明的故事還是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的；因爲這是一面鏡子，——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鏡子。

劉明的故事的背景在距今五年以前。時事推移，今天抗戰的現實跟那時已不一樣，昔年萬千青年所憧憬的道路今更荆棘重重，而劉明似的牢騷消沉的青年其所以牢騷消沉的成因也不與劉明盡同了，然而從劉明的故事所得出的教訓的原則，在今天依然是資我們借鏡。這一點，可說是這

本小說對於今天的現實的意義，同時也是我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不應該忽略的地方，至於此書文字之樸素而委婉多姿，人物描寫（如主人公劉明）之細膩而生動，則有目共賞，讀者自能玩索，用不到我來喋喋哢舌了。

（三十二年十月茅盾記於唐家巷，時陰雨且將旬日，報載倭寇正窺犯滇西，瀘水怒江，激戰方殷，而大湘西南三角地帶，敵寇仍伺機蠢動云。）

新綠叢輯七旨趣

戰時交通不便，往往一個刊物早已停掉了，但遠地不會知道，還是源地寄些稿子來。並且也還有懇切地囑咐：如不能容，請另爲介紹的。一個寫作者對自己嘔心血的成果的寶愛，本爲人所同，而脫稿後求能與世人相見，嚶嚶求友之心，亦人人所共有。出版界的現象，老板們常嘆佳稿難得，（自然這所謂佳，含義甚廣，而能推銷常爲主要條件之一），而事實上有些佳作又找不到機會出版。陌生名字的作品發表在期刊上，其機會是百分之四五十，但要以單行本印行，其機會恐怕還不到百分之十。這倒也不能單怪出版家沒有冒險精神，更不便怪讀者缺乏冒險精神，實在是出版界中有些「冒險家」往往藉「刀漿糊之力」，印一些東西，給讀者的印象是不大好的。

冒險來印幾本陌生名字的單行本，探險似的讀幾本陌生名字的作品，這兩種精神都是應當有的，說得堂皇些，那就是對於文學的發展有利益。但自然，不能叫人家印了一定賠本，讀了一定失望。書報評論權威之建立，既非一朝一夕的事，那麼，倘有審慎其事，不漏不濫，先找得願意

冒險的出版家，或者也容易誘發讀者的探險精神而一新風氣罷？

這一點小意思得到了贊同者的時候，這一個小小叢刊算是有了眉目了。於是整理積稿，得若干篇。作者天南地北，既非相識，故無所謂好惡，倘有銜鑑失當，罪在我們的學力不夠，但珍惜寫作者的心血之心，自信是還誠懇的。讀後有感，同人中誰有時間寫就寫一點，附印卷端，以求印證；非敢自謂品評，聊且比於閑路喝道，未能免俗，然而據說這一點也不可免的。

旨趣不過如此，效果尙待未來。所望海內賢達不吝教言！

序「沒有結局的故事」

作爲人間萬象的一個「特寫」的鏡頭來看，或者，作爲冷雨淅瀝的秋夜聽一個靈魂上負創傷的孤獨者的喃喃自語來看，又或者，作爲大風暴剛過去，萬籟忽靜，唯有階前老樹上水珠搭搭的往下滴，而無端惹人洞腸盪氣來看，我要說道「沒有結局的故事」是美的。

如果不去尋根究底，追問那個「我」到底抱着個怎樣的人生觀，如果不用理智的刀去解剖那個「我」的百無聊賴的心情，忽冷忽熱的性格，如果只把他作爲一個性格的標本，在某種社會環境時代氛圍中數情多感而又無可奈何，表面上冷却下來的知識份子感情與理智的矛盾泛起在行爲上的泡沫，那麼，我又要說這一個「我」的身世遭遇及其所以成爲那樣的一個人，將不但引起同情，而且是深思，將不但是一面鏡子，讓人家從牠那裏照見了自己，而且也是一記當頭棒喝，使人憬然覺悟到孤傲不等於剛毅，不修邊幅和胸襟闊大亦頗有別，有熱也不一定能發光，而有病呻吟也並不是怎樣可以自滿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個「我」的故事將不會有結局，而沒有結局也就是有結局——因爲

這結局不也是可想而知麼？

作者的目的未必是在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他給我們聽一個靈魂的呻吟；感情的波瀾掩蔽於漠然的苦笑之下，有旋律，然而多麼舒徐，淒憫，像靜泉汨汨，決不是奔流飛濺，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要求他的文字有另一個式樣，如其換一種格調，就將破壞了形式與內容的合一！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唐家沱

爲「親人們」

住在鄉下，睡得早，午夜夢回，有時聽得貓頭鷹的唵哨，但不久，一切又都沉寢了，靜的就像會聽到大地自轉的聲音；似乎這樣的寂靜永無止境了，可是遠遠地打破沉寂者來了，不知名的鳥啼，一聲兩聲像遊絲一般，在濃霧中搖曳着。這一根絲，愈細愈有勁，細到像要中斷的當兒，突然一片啾啾的聲音浪從四面八方一齊來了。無數的鳥兒在謳歌黎明。於是在牀上等待天亮的人也繫一口氣，確信那陰森寒冷的夜終於過去了。

這樣平凡的經驗，可說是每個人都有過的罷？

但這樣平凡的思想也許不是每個讀了這個小小的詩集的人們會得感到的罷？

把技術放在第一位的人們是不會感到的；神往於山崩海嘯，絢爛輝煌，而對於樸素平易不感興趣的人們，是不會感到的；不從始發的幾微中間看出油然而莫之能禦的氣運的人們，大概也不會感到；而偏愛着貓頭鷹的唵哨的人們，自然更是不會感到的了。

今日的詩壇，的確不算寂寞，但這是怎樣的不寂寞呢？這好比一個晴明的秋夜，驛月高懸，

擊星星點點，銀漢橫斜。

讀了這本小小詩集，或者會喚起了望見銀河那時的驚喜的感覺罷？

這裏的許多位作者，有的是已經在刊物上發表過他們的作品了，有的恐怕還是第一回將他們的心聲印在紙上。風格也各人不同，有人傾訴他對於最親最親者的懷念，有人在對於遼遙的未來寄與熱烈的希望，有人祇着自己的創傷在低呻，有人則高舉旂幟唱着雄壯的進行曲。他們都有一點相同：抒寫真情，面對光明。他們更給我們同一的確信：「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詩人是對於時代的風雨有着預感的鳥，特別是不為幻影迷糊了心靈而正視現實的詩人，他們的歌聲常是時代的號角。在陰沉的日子裏讀完這些詩，幾年前一個深刻的印象又喚回來了。

那是在北國，天剛破曉，我被嘹亮的軍號聲驚醒了。我起來一看，山崗上乳白色的霧氣中一個小號兵面對東方，元氣充沛地吹着進行曲，他一遍一遍吹，大地也慢慢轉身，終於一片霞光罩滿了高山和深谷。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

關於「遙遠的愛」

如果說「遙遠的愛」有着細膩的心理描寫和俊逸的格調，這是對的，然而還嫌不足。

如果說牠更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長的抒情的氣氛，而構成這氛圍的，又是那雖非縱橫磅礴但却醇厚深遠的對於人生的熱愛，對於崇高的理想的執着，這也是對的，然而仍覺不足。

我所以感到喜悅的，是因為這一部小說給我們這偉大時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個明晰的面目來了。自然，也還不會全部無遺地描出這時代的新型女性的丰采，故事的發展只到了女主角（羅維娜）終於堅定了自己的立場，認清了自己應該走的道路——只到這裏為止；作者把女主角投入了新的生活以後又將如何更向上發展的一切都留待我們去猜度。可是從書中已經分析了的心理過程來看，我們有理由敢為這位女主角的前途無保留地慶祝。通過了仔細分斷的內心鬥爭的過程，我們看見一個昂首闊步的新女性堅定地趕上了時代的主潮，——全身心貢獻給民族。

羅維娜的時代和二十多年前她的母親輩的時代可以說是不同了，也可以說仍然有點地方相同。二十多年前的「娜拉」，從禮教的圈子，從「傀儡家庭」中，挺身出走，要做一個「堂堂的人

」；現今的「羅維娜」，則要從狹的自私的愛的圈子，從舒適的然而使人麻醉的生活環境中，掉臂而去，——去做什麼呢？去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線貢獻她的一分力量。二十多年前的「娜拉」跳出了舊禮教的圈子，可以安心滿意地蹲在一個角落——狹的自私的戀愛的角落；今天的「羅維娜」却不願安於這一角落，民族解放的戰鬥的號角在招喚她，她唾棄那兩人廝守着的狹的自私的愛，她的愛是擴大了，而且在擴大的愛人民愛祖國的事業中，她再不能允許自己把一個從這大事業中脫逃的人作為私情的愛的對象。然而這一昇華，却需要代價。小市民知識份子的羅維娜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她這一內心的鬥爭，便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最有精采的篇幅。

我們的女主角不是一個無情的人。從書中的一些「點睛」的筆法看來，她還是個一往情深的，她在私情的愛這方面，始終不曾背棄了她的丈夫高原而轉注於他人。甚至當高原因為不了解她，因為自私而對她決絕以後，她對高原也未嘗懷恨。而最後，既已「情斷義絕」，從香港逃難出來的高原，落魄在半途，我們的女主角還接濟他金錢。高原呢，本質上也不是無可救藥的壞人；他最初也是獻身於民族解放鬥爭的大事業的，那時他比羅維娜進步。不過因為意志薄弱，後來就貪圖安逸，滿足於一個不愁溫飽的職業，一個小小的溫暖的家，且又不去了解羅維娜內心的苦悶，以至一天一天精神上疏遠起來了。

但問題不在高原。問題在我們的女主角。

當她既已見到高原一天天從時代落伍，既已感到他們之間的距離一天天在遠了起來，而且感到兩人間的危機將終不可避免而發生苦悶的當兒，她好像是個宿命論者，竟沒有什麼動作。私情的愛尚未轉移的她，對於高原的沉淪，對於他們中間的將要發生的危機，似乎不應如此冷漠。當然我們不應從故事的佈置上去指摘作者爲什麼不這樣而偏偏那樣，然而我們試掩卷一想，高原這人物在書中何其淡淡的像個影子一樣；高原這人物，沒有自己的存在；書中之有這一個人，好像只是爲了襯托我們的女主角。如果作者在羅維娜內心鬥爭的時候又強調了她和高原的思想的鬥爭，那或者情形就不同了罷？如果把這影子似的高原充之以血肉，那總不是無意義的筆墨罷？照書中的故事看來，有好幾處都有給予高原以肉血的可能，不過我覺得上揭的一點或者是最切要的罷了。

另一個人物，雷嘉，也給我們以相同的印象。

在「雷嘉」這名字下，作者塑造了一個好的坯子。他和高原不同型，然而同樣地將爲這偉大時代所拋棄。他處處以前進者的姿態出現，但只是一個空論家——不，比空論家還要壞些，他是喜歡用前進的議論來裝飾自己，正像他老是要使得自己的西裝筆挺，儀容修整一樣。雷嘉曾經是

羅維娜的思想上的領導者，但當羅維娜戰勝了自己內心的矛盾而且決定投身於新的生活新的戰鬥的時候，雷嘉的漂亮的外衣褪下了，暴露出一個靈魂渺小的自私的原形來了。作者筆下的雷嘉，比高原要立體些；這是一個好的坯子。然而這坯子還沒描繪上足夠的血肉。照書中的情節看來，雷嘉應當不止扮演了女主角性格發展的陪襯的身份，但是直到故事結束，他給我們的印像是：書中之有這一個人，好像也只是爲了襯托我們的女主角。

雷嘉和高原在書中的作用，大致相仿。

甚至女主角的哥哥，羅維特，也是一個爲了襯托女主角而出現的陪客。更不用說那在開卷時上場而到故事快結束時又露一面的另一女角桓蓓了。

維特是怎樣一個人呢？作者告訴我們：在女主角的生活的轉變中，這位哥哥曾起了決定的作用。少年的哥哥受了偉大理想的召喚而離家出走的時候，女主角的幼小的心靈上會有過深刻的激動，從此她生活的方向似乎便有了個指標；而在我們的女主角走完了內心鬥爭的艱苦的道路，正待舉步跨入新的一階段時，壯大了而且鍛鍊得頗爲堅強的哥哥又一度出現，接引他的妹妹走到新的戰鬥的環境。維特對於我們的女主角的性格的發展，有這樣重要，然而維特在書中只有側面的描寫。這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革命的戰士，如果作爲女主角性格發展的引體來看，我們

原可不再苛求，但如此則書中唯一的男性的革命戰士落得了概念化了，而且他也只是爲了襯托女主角而被拉上場來的了。

高原，雷嘉，維特，這三位，都是對於女主角的生活思想的變化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用怎樣的筆墨來寫這三位，作者自有她的打算，如果誰喜歡在這些上頭提意見，那話就多了，而且大非必要；不過我們不得不說的，是這部小說的如此這般的處理人物的手法使我們發生了如下的感想：

女主角是有血有肉，光豔逼人的，然而滿場戲文，只她一個人在做，其他人物不過是孱百脚旂的跑龍套，或甚至只是一些道具罷了。

也許作者是有意爲之，也許是無意，但這部小說的這樣處理人物的手法和作者所採用的全書結構方式，是有連帶關係的。

全書的結構方式很單純，故事的展開處處以女主角爲中心。第一節是個冒頭，算是例外；此後，進入了回斂，我們就跟着女主角走，——我們從女主角的童年看到她結婚，又從結婚看到她苦悶，終於克服了內心的矛盾而毅然跨上了新的更有意義的生活；我們的女主角帶着我們遊歷了她生活的各階段，我們只從與她直接發生關係的場合才見到了其他的人物，作者不會放開我們讓

我們離開女主角而跟在其他人物後邊看看他們各自之所作所爲。

故事的展開以主角爲中心，這原是很謹嚴的結構方法；但如果弄成了處處須要主角帶路的局面，那不是譁嚴而是呆板了。這部小說幸而還沒怎樣呆板，作者的抒情氣氛的格調作了適當的補救，但是成全女主角，却把其他人物犧牲了。這怕是書中其他人物如高原、雷嘉、維特等等，都好像只是爲了襯托女主角這才出現的緣故罷？

故事的展開以主角爲中心而又處處由主角帶路者，倘用第一人稱的體裁，似乎更相宜。「遙遠的愛」好像是在第一人稱的情緒下採用了第三人稱的結構式樣。因有此鑿柄，於是影響到結構上的完整，例如第一節就不能和全書主要故事扣得很緊，也影響到主角以外各人物的現實性和獨立性，例如我們在上文討論過的各點。這是本書的美中不足。然而這一些技巧上的缺點都不能掩蓋本書在思想認識方面的攝人的光芒，也無傷於作者的煥發的才華；在整個上看來，我們有理由向作者要求更驚人的作品。

熱愛人生，認清現實，這在一個作家，比技巧熟練，其可寶貴，何止百倍；這在一篇作品中，其可寶貴，亦何止百倍。忠實於人生的作家又何必自餒。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

窒息下的呻吟

——序甘永柏的小說「暗流」——

到現在為止，描寫戰時經濟動態的作品，還是寥寥可數的。投機橫行，游資狂瀾，通貨膨脹，生產萎縮，土地兼併，赤貧滿野，——這種種的現象，每天翻開報紙就可以看到。只要不是喪心病狂之輩，誰也不會閉起眼睛陶醉於欺人自欺夢囈似的「樂觀」。即使是最不關心時事的人，只要他還不能不生活，還不能不有衣食住行，光是突飛猛漲的物價也就够叫他意識到巨大的變動正在發展，經濟的危機正在一天一天深刻化，而他——一個守法安份謹遵「莫談國事」訓令的老百姓，正好比輪在萬丈深淵的邊沿，一向糊里糊塗，待到覺得不對勁時，他已經翻不過身來了。

且不從深處說罷，單是把這些現象寫出來，讓大家看一看，讓一些「駝鳥」們多少有點不舒服，難道還不應該，難道不是對於抗戰有利益？真能愈戰愈強的國家決不粉飾太平，決不諱言缺點，真正民主的國家決不禁止批評。真心要民主的人決不認為暴露黑暗便是造反。中國的文藝

作家對於自身的任務，對於現實的把握，一向是在盡其最大的努力，然而寫作的不自由使他們無從在文藝崗位上認真做一點事。例如關於戰時經濟動態的題材便是地雷陣似的你一觸及處處要「炸」。有一道很乾脆的條例：只准說好，不准說壞。當然，誰不願意什麼都好，誰又不願意多說好話？但是，說謊話則於人格有虧，具有責任感的作家是不肯做的。一個文藝作者即使够不上「靈魂的工程師」的程度，總不能自甘墮落而在人民羣中成爲一個騙子。這就說明了爲什麼直到現在取材於戰時經濟動態的作品還是那樣寥寥可數了，同時也可以想像到，在這一方面真正能够寫一點什麼的作家有力無處使的那一種精神上的痛苦，實在是够慘的了。

然而，從心的深處發出來的呼聲終於不能抑制，口雖被堵住，還會呻吟。「暗流」可說就是這樣的一種呻吟。它從側面寫工業的衰落，從主人公的痛感到「生活空虛」的頹喪的心情上暗示了從業者焦頭爛額，徬徨無措，同時，迂迴而又淡淡地，也暗示了一個「理想」，一個似乎渺茫但只要有決心便是極其現實的「計劃」在主人公的心中逐漸凝結而成形；於是在本書的結束處便也有個弦外之音，使得讀者捲卷而嘆息，但也點頭自語道：結束處正是新的開始。

作者的用心是可以猜度到的：竭力不觸到那太多的「地雷」。譬如一個工兵，他的任務是挖出那些「地雷」，但是偏不准挖，只好看看那些「地雷」輕手輕腳迴避着繞了過去，這用心是够

苦也够慘的罷？

但作者是還打算弄一點什麼來調和「呻吟」的苦味的罷？作者對於將來的希望有信心。雖已啼笑皆非，他還是要破涕爲笑的，這也許就是爲什麼在他書中有了「浪漫蒂克」的調子。

在某種意義上，本書的故事是「浪漫蒂克」的；男女兩主人公的性格，也頗含「浪漫蒂克」的成份。而男主人公的終於不得不在「第三期肺病」，終於不得不抱着他的遙遠的「希望」而在「第三期肺病」面前敗退，又彷彿是有所象徵似的。「第三期肺病」！但醫生說也許還有救。如果我們以爲這指的當真是主人公的病，那或許我們太老實了罷？在男主人公的閃爍不定的好像要抓撲什麼而又無從措手的行動中，在他那種漠然而又煩燥的心情中，我們看到了一顆伏在深處而熱蓬蓬跳着的心。我們十分同情地追蹤他，十分期待地盼望在他生命之旅程的某一段上我們會終於看見他破空飛去。或許會有讀者看到終於不是而感得失望，那也因為他對於主人公實在同情。應該怎樣安排主人公的結局這才盡善盡美呢，不是我們應當來下結論。作者已經做到了的，是給我們看：一個善良而熱烈，有抱負而又帶着先天的矛盾的一個人，怎樣在苦悶，在掙扎，在呻吟。而呻吟和「浪漫蒂克」的交錯，使這本小說有一種光彩，一種情趣，一種美。

然而在基本上，這是告白了無數作家們在窒息之下呻吟的。有那一天，文藝作家可以自由呼

吸，大聲呼號，不再呻吟，——那時，中國也就翻了身！

一九四五，四，六，重慶郊外。

「最理想的人性」

——爲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

青年們時時提出一個問題：讀什麼書？如果是對於文藝有興趣有志向的，往往問：如何研究文學？刊物上因此亦有特設「讀書顧問」一欄，隨時解答。魯迅先生的遺著便是時常被提起的。事實上，魯迅先生的遺著，也是被廣泛地讀着的。研究「魯迅思想」的書，似乎也出了幾本了。這都是可喜的現象。魯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不但青年們不可不讀，就是研究中國文化，探討中國問題的人士，也應當讀。這大概不是我一人之偏見而是凡有理性愛真理的人們的公論；問題在「如何」讀。

讀書，本來要有方法。不得其法，譬如兩手掬錢，而沒有繩子串聯起來，終究不受用。讀魯迅著作，尤其要有方法。理由很明顯，因爲他的著作大部分是隨時隨地爲了反抗惡勢力爲了闡揚真理而寫成的，他沒有時間關起門來寫一部有頭有尾有間架，如古所謂「一家言」的著作。然則

，魯迅著作就不成爲「一家言」麼？他的思想就沒有體系麼？此又大大不然。淺識妄人會以此譏魯迅爲「雜感專家」，但這適足以表現他們的無知與成見，不足以損魯迅的毫末。現在凡是有誠意，愛真理的人士，都承認魯迅著作自成一家言，自有其思想體系，——儘管在形式上，是隨時隨地寫下來的作品和雜文。正因此故，讀他的著作，必須要有方法。

有一種讀書方法我以為是不足取的：這就是「見木不見林」的讀法。犯這毛病的人，譬如貧子驟入寶山，迥黃轉綠，目眩神搖，恣意撿拾，皆以章身。但亦止於章身而已，雖足炫人，自己未有受用。嘗見有些文章，頗多引用魯迅先生的文句，但細釋連篇的意義，殊嫌蕪沓，因而魯迅文句之被引用在內，正似醜婦戴了滿頭珠翠。也許他並不是存心這樣做，——而且我覺得即使是存心這樣做，亦未可厚非，因爲至少他對於「珠翠」之可寶貴是明白的，而且也信任的，但是，我不能不說：所以致此的原因恐怕還是爲的犯了「見木不見林」之故。我們讀一個思想家的著作，主要是爲攝取精華，化爲自己的血肉，以增長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力，觀察力，以及分析批評的能力，倘若這一點辦不到，則記誦雖多，亦只能流於擷摘章句，爲行文之裝飾而已。但是爲什麼這一點辦不到呢？恐怕還是因爲未讀之前，沒有先立一個計劃，換言之，沒有先扼要地提出幾個問題，作爲研讀的範圍，作爲攻讀的標的。

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博大精深的；如果要提問題以作攻究之範圍，那就可以提許多問題。例如，在一般文化方面，就可有中國傳統文化問題，西洋文化問題，中國吸收外來文化問題等等；在文藝方面，可有文學與革命，大衆化，創作方法，文藝修養，等等問題；在思想方面，在社會問題方面，也同樣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一種方法。但也有毛病，即太具體時，未免瑣碎，而事實上仍不能包涵盡之。而且這樣極細地分類研讀魯迅著作，恐怕倒反有礙於全盤的了解，結果亦會不自覺地陷於「見木不見林」的錯誤。

於是有人從大處來提問題了：從最近幾十年社會的思想的運動歷幾個階段，來研讀魯迅著作；例如從初期的啓蒙運動，「五四」期的新文化運動，「五卅」以後的社會的思想的運動，來研究魯迅的思想對各時期的貢獻和影響。或者，換一方式，從民主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來研究魯迅。這是比較好的方法。好處是：可以對魯迅思想得一全盤的了解，可以使魯迅的文化功業和當前的現實聯系起來，因而他的全部著作成爲活的指針而不至被當作死的教條，並且，由於不把魯迅思想孤立起來研究，可以使我們明白「現在」如何從「過去」發展而來，而「未來」又怎樣孕育於「現在」之中。雖然迄今爲止，尙未見有十分完滿的運用這一方法的研究的成果，但這一方法之正確，應該是無疑的了。

然而這應當不是說，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也是正確的）提問題來研究的方法。

許季希先生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一九〇一—一〇三年），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麼？（三）牠的病根何在？」

（見魯迅紀念集第一輯許著懷亡友魯迅）。試懸此相聯的三問題於座前，而讀魯迅著作，我們將得怎樣的答案呢？請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干偉大的 Humanist 中間一個——

魯迅！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 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福祿特爾是這樣的，羅曼羅蘭是這樣的，高爾基是這樣的，其他各時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頭的戰士莫不是這樣的，魯迅也是這樣的。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與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攻擊一切摧殘、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爲的枷鎖，——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 Humanist 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於「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麼，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而現在則鍊鎖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歷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產生而養育的。講到什麼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確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豔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脚。魯

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評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圖案和規章，而追問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 Humanist 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薔艾，培養「人性」中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於這樣事業的人都明白認出那些「薔艾」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游長，又在什麼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一定的時空條件之下，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中華民族在二千多年的長時間中，在秀麗肥沃的大陸上，而且是在周圍近鄰的異民族的文化水準都遠不及我的優越的陶醉中，牠的國民性將有如何的特點，而此等特點對於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其為禍為福又如何：這些都不能不是每一熱愛自己的民族與文化的人士必須嚴肅追問的，然而我們古來的哲人又給了什麼解答呢？最近八十年來，我們一點一點知道除我們這民族以外，世界上還有不少同樣優秀而且現今駕乎我們之上的民族了，這些的民族性也漸漸從書本上（可憐，還只是從書本上）被知道了一點，然而我們自己的呢？「最缺乏是什麼」？「病根何在」？似乎最多的還是空洞抽象，從什麼精神，什麼本性，甚而至於從人爲的畸形的禮俗，去找解答。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尚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或許我們還覺得他的答案還沒達到結論的階段，然而每一個無偏見成見而愛真理的人，一定能承認他的畢生努力已經給這三個相聯的問題以無限寶貴的啓示，而且他是第一個「從舊壘中來」，看得格外分明，又能依據進步的科學觀點，從物質基礎上對這相聯的三個問題下解答的。

在他逝世五週年的今日，我們是不是應該試從這相聯的三個問題上從事於他的著作的研究？我相信是必要的。我以為從這相聯的三問題下手，也許比從其他方面，更能把握到魯迅思想的心龍？

即以「阿Q正傳」而言，如果這阿Q作為農民的或流浪無產階級的典型來看，也不算刺謬的話，那麼，是否我們倘把他代表了國民性的某幾方面來看，能够更發人深思，更加擴大了我們的視野？是不是從「阿Q相」上，我們找出了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一些什麼，及其病根來？我想是必然可以的。

人類創造了文化以征服自然。同時亦要征服人的原始性，以及人類在歷史過程中所自造的阻礙「人性」向真美善發展的種種人為的桎梏。所謂文化是「第二自然」，文藝家是人們「靈魂的

工程師」，都是從這意義而來。「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不能不是我們最大最終極的目標。爲求「最理想的」，我們不能不抨擊那些非理想且不合理的，魯迅先生一生努力在此，——建設從破壞中來。一切偉大的 Humanist 莫不皆然。

九月廿六日

永恆的紀念與景仰

一九四四年最後那一天將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戰士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反法西斯的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羅曼·羅蘭，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

對於我們中國的知識者羅曼·羅蘭不是一個生疎的名氏，他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同是今天的進步青年所愛讀的書；我們的貧窮的青年以擁有這兩大名著的譯本而自傲，亦以能轉讓借得一篇為榮幸。

而且我們也不能忘記：當我們這時代的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由敬隱漁譯為法文而在法國出版時，羅曼羅蘭讀了以後會是如何感激而驚喜的；當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廣大的中國讀者見面時，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兄弟們宣言」的寥寥數語中，給我們以多麼大的鼓勵。那時我們正在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從淤血堆中掙個窟窿透口空氣的千千萬萬爭民主求光明的青年們，看到羅曼羅蘭對我們號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升，一個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恆久，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

——一切光明：學問，美，人類的愛，公共的進化，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昧，懶惰，迷信和野蠻。我是附順前者的。無論他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爭民主求光明的鬥爭中我們不是孤獨的，我們有了堅強的信心了。

我們也還記得：當「五四」初期，思想界還沒有個中心的時候，爲了批判資本主義文化而求啓示，會因探索「新浪漫主義」的內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羣中湧起了研究羅曼羅蘭的熱心；在話劇運動的初期，羅曼羅蘭的「民衆劇」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討論，田漢先生曾經熱心地介紹過這一理論。

我們現在不但有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還有「革命戲劇」的大部分譯本，（羅曼羅蘭自稱其以法國大革命爲題材的劇本革命戲劇），有葛萊郎波的譯本（？）也還有茲懷格的羅曼羅蘭傳的譯本，在當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們可以說，除了高爾基以及若干蘇聯作家而外，羅曼羅蘭是卞蕭伯訥，德萊塞，紀德等等同爲我們熱心研究的對象。而我們對於羅曼羅蘭的熱心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卽因他第一次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戰時期所發表的「精神獨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戰時期所寫的反戰論文的結集「超于混戰以上。」而也因爲在一九三二——三三年頃，法西斯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揚的時候，羅曼羅蘭是國際文化界中的反

法西斯與保衛世界文化的立在陣頭的戰士。

現在，正當法蘭西獲得解放而法西斯強盜的末日即將到來的時候，羅曼羅蘭——這位反法西斯的巨人和老戰士却以七十九的高齡謝世了。在世界範圍的反法西斯鬪爭中，人民的勝利於今是確定的了，然而艱巨的工作還在前面，從軍事上政治上消滅了法西斯以後，還得從文化領域中徹底掃蕩法西斯以及準法西斯的毒瘤，這一工作不見得比消滅法西斯的武力輕便些。我們在這時期特別需要羅曼羅蘭。他的逝世，對於我們——全世界，不但法蘭西——的損失之大，是無可比擬的。

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文學家，音樂家，戲劇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戰事的第八年，在向前奮鬥以求民主政治真正實現的今天，對於這一位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的逝世，不僅是哀悼就算完了事的。我們的處境也許比西歐的同志更爲嚴重些，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也許比西歐的同志所面對的，更爲艱巨些，而我們的主觀力量，（不必諱言），比起西歐的同志來，也還覺得薄弱的。然而我們有信心，我們的信心是從「五四」以來的思想鬥爭的經驗來的，是從魯迅先生的光榮的業績裏來的，而也是從世界的反法西斯文化前輩的努力與輝煌的事業而來的。

在今天，我們文化人，正經歷着思想上的絕大的苦悶，也正在經歷着一次絕大考驗。今天，

人類歷史新的一頁正在展開，但也是一個偉大的鬥爭的時代。今天，相同于羅曼羅蘭在上次大戰以後的「摸索和徬徨」的情緒，在我們文化人中，恐怕也還是相當普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以哀悼和紀念之心，來追溯羅曼羅蘭一生所經過的思想歷程，將能激發我們的勇氣，增強我們的信心。

羅曼羅蘭所走過的，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路。當他七十歲時，他感謝蘇聯人民對他七十大的慶祝，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經走到了，這個旅程並不平順，然而完結得很好。……「經過苦痛而後快樂」。經過了七十年來的戰鬥與勞苦互相更迭的長途旅程，我才到達了你們所建造着的「快樂」，這世界人類的新社會。……」（用戈實權的譯文）。而在另一時，他又會這樣告訴我們：「你可知道我是從什麼地方，從什麼年代的深處來的？我是從潰滅了的巴黎公社。從一八七〇年慘酷的普法戰爭的時期來的。……我的來處是在戰爭期以及在革命期兩度被征服過的法蘭西，是當我的童年時代和青春時代一直在悲觀主義的重壓之下屈伏過的法蘭西」（用戈實權譯文）。但是，時代和「來處」，並不能把羅曼羅蘭在懷疑和悲觀的深淵，也不能把他驅入「象牙之塔」，——雖然他早年的環境和教養是很有這可能的，當他畢業于高等師範，游學羅馬與德國之後，曾經深受

托爾斯泰和華格納的影響。托爾斯泰的充滿了熱情的呼聲「我們怎麼辦呢？」曾經使他深受感動。他和托爾斯泰的蘊潛在他「那時期是他的路」，他這樣說；從此他立上了爲人民——爲人類服務的偉大決心。

然而，人民的道路，——人類的歷史的道路，是向那一個方向去的？此去又該經過怎樣必不可少的步驟呢？這些問題，當時的羅曼羅蘭是有他自己的見解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可說是他的這見解的形象化，那麼後來的「精神獨立宣言」便是詳細的註腳，抽象的理論。「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創造就是消滅死亡」，這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淋漓痛快地發揮了的。克利斯朵夫是從窒息的青害的優階級文化中鑽出頭來的英雄，——以創造戰勝一切醜惡與危害的大智大勇的英雄；羅曼羅蘭曾經說過：「我那時是孤獨的。我在一個精神上敵對的世界裏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種不健全的文明，反抗一般脛稱的優秀階級的毒害的思想，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需有一個眼目清明，心靈純潔的主人翁，有着相當高卓的靈魂以便有說話的權利，有着相當雄壯的聲音以便令人聽得真切，這個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用戈賓譯文）。

從約翰·克利斯朵夫（一九一二年完成）到超于混戰之上，羅曼羅蘭是從「創造即歡樂」的說教者走到了實際鬥爭的戰士的陣頭了，但在基本思想上他還是始終一貫的，這就說明了後來他

在「光明社」何以會跟巴比塞意見相左。

直到此時為止，羅曼羅蘭的基本思想是個人主義，——或者也可稱新英雄主義。他認為「自由而闊大堅毅的個人主義，便是人的最高價值，人的前鋒，」而「約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理想的化身。羅曼羅蘭在「精神獨立宣言」中表示：此種精神的個人主義是獨立的，不附屬於任何民族，不附屬於任何黨派，保持着超利害的客觀性，作為一種科學的氣象台，以清明的眼光照耀着人類的前途。他更進一步說，這樣的精神的個人主義者可與人民的戰士攜手而且為其引路。

這樣的「理想」，也許是「美麗」的，不幸面對着現實之時，却碰了釘子。一九二〇——二七年間，正是羅曼羅蘭的「摸索和徬徨的年代」。他回到了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他又向甘地主義伸出了乞援的手。但是，大智大勇大仁的羅曼羅蘭終於突過雲陣，「向過去告別」，「從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精神的個人主義的羅曼羅蘭終於成為社會主義的戰士。

一九二七年以後，羅曼羅蘭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可以他的幾部著作來表示。這幾部著作正可視為他的思想歷程的里程碑。

向過去告別論文集出版於一九三一年，在這里他批判了自己過去的思想，宣告他的對於社會主義的擁護；用他自己的話，這是「已經毀了身後的橋樑了，不管我後面有橋還是沒有橋，我永

不再回頭了。」

保衛新世界論文集出版於一九三二年。

動人的靈魂（長篇小說）第五六兩卷「誕生」完成於一九三三年。這一部共六卷的巨著，開始寫於一九二二年，初成第一卷「安娜德與西維爾」，及第二卷「夏天」，中經間歇。一九二六年更成第三卷「母與子」，又隔五年，那是一九三二了，成第四卷「一個世界的死亡」，翌年完成最後兩卷（五與六），均題為「誕生」。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相同，這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時間。前後亦跨十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三。然而和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作的十年間所不同者，這後十年正是羅曼羅蘭所自稱為「苦鬥十五年」的重要階段，如果前十年可稱為羅曼羅蘭前期思想形成的階段而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其總結，那麼，後十年便可說是羅曼羅蘭後期思想發展的階段，而動人的靈魂 最後三卷便是他「摸索」而合於大道的宣告。

安娜德最初還是「克利斯朵夫型」的人物，但是經過了幻滅以後，她漸漸改變了，終於在她的兒子馬爾克因為反戰（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謀殺以後，她堅決地作為本階級的叛逆者而踏上兒子所走的路——「人民大眾的歷史的道路。她說：「沒有力量的白旗染上了紅血，已經成為紅旗了，這旗幟將為千百萬人所有；安娜德將拿起這旗幟與千百萬人一起繼續去戰鬥！」而羅曼羅蘭

是和千百萬人一起去戰鬥了，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後成爲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這樣我們在長篇小說動人的靈魂中看到了羅曼羅蘭早期思想繼續，也看到了「摸索與榜徨」，最後又看到了自我批判的「向過去告別」，大踏步走向新的「誕生」。

怎樣從一個個人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從一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足足走了七十年的長途，光是這一點堅韌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經值得我們萬分景仰了。他這長途不是沒有痛苦的。在他寫給他夫人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我的累累的創傷，這就是生命給我的最好的東西，因爲在每個創傷上面都標明着前進的一步」，這就是羅曼羅蘭之所以偉大。

在某些點上說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不也正如羅曼羅蘭所自稱的「從什麼地方，從什麼時代的深處來的」，有些相仿麼？五十年來的中國當然和一八七〇——一九二〇年的法蘭西不同，但五十年來的世界不就是羅曼羅蘭所「摸索」的時期那一世界麼？而時代逼迫着我們回答「我們該怎麼辦」，不更緊急於羅曼羅蘭的一九二二——二七的當時麼？

讓我們認真來思索這一切，這該是時候了！

擺在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爭取民主，而爭取民主的首要條件，則是揮起我們的筆桿，反對法西

聯的侵略。羅曼羅蘭一生的艱巨的行程給我們榜樣，也給我們勇氣和信心，爲了哀悼和紀念這位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我們的「摸索和徬徨」——如果還有，不該從此結束了麼？「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們已經讀過了，現在我們該讀「動人的靈魂」了。

我們相信：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對於偉大的羅曼羅蘭的逝世，將有無窮的悲哀，對於產生這位巨人的光榮的法蘭西民族將永誌其敬愛與感謝，中國文藝工作者認爲這不單是法蘭西民族的損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損失，也是中國人民大眾的損失；我相信我們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將以善於學習羅曼羅蘭作爲永恆的紀念與景仰。

「向過去告別！」

讓我們把這一句話作爲座右銘罷！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高爾基和中國文學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在上海「蘇聯呼聲」電台廣播詞】

今天是偉大的蘇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逝世的十週年紀念。

今天上午九點鐘，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中華全國木刻協會，中華全國漫畫作家協會，中國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上海市音樂協會，上海戲劇電影協會，上海美術作家協會，八個團體，在滬光大戲院開了一個盛大的紀念會，表示我們對於這位偉大的作家——思想家的敬意。

我們知道，每年的六月十八日，不僅是蘇聯人民熱烈地紀念這位偉大的文化導師，全世界各民族的民主進步的人士也是在熱烈地紀念他的；在我們中國境內，也不僅是上海的文化界人士開會紀念，全國各地都有民主進步的人們在開會，在寫文章紀念他的。爲什麼呢？因爲高爾基的一生是爲了人類的幸福而奮鬥不屈的，因爲高爾基的對於人類社會的理想是符合了全世界人民的要

求的，因爲全世界的爭自由、求解放的民衆是在高爾基不朽的作品中得到了寶貴的指示，鬥爭的勇氣，以及勝利的信心的！

『五四』以來，我們中國的文藝界，從高爾基所受的影響，非常之大。從『五四』到今天，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我們翻譯了高爾基的作品，已經出了單行本的，差不多有一百種，其中如『我的童年』、『夜店』、『好細』、『三人』、『四十年』，都有兩種以上，乃至四五種的譯本。從『五四』到今天，對於高爾基的介紹和研究，單說成本的書，也差不多有二十種。『向高爾基學習』，成爲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座右銘。

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從高爾基的生活和作品中看出了他們自己應該走的路。

高爾基本人的生活，就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從幼年時代起，直到他已經成爲全世界聞名的大文豪，他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在鬥爭中；——跟飢餓鬥爭，跟疾病鬥爭，跟沙皇政府的特務鬥爭，跟統治階級御用的文人鬥爭，乃至跟全世界抱有偏見、誣蔑勞動大眾的幫閒文人鬥爭。從八歲起，這位未來的偉大的天才作家就喪失了父母，不得不自己去找麵包。從此以後，就開始了平常人不能忍受的艱苦鬥爭的生涯。爲了肚子能够吃飽，他幹過各種各樣的職業，到處流浪，他的足跡遍及於半個俄羅斯，大部分是步行。他做過皮鞋店的小伙計，輪船上廚房裏的雜役，碼頭小工

，麵包師的助手，鐵路上的守門人，畫神像的畫匠們的徒弟，跑江湖的戲班子裏的『龍套』，他也做過園丁，看門的人，戲院裏的唱歌隊員，——一句話，他差不多幹過三百六十行。從古以來，沒有第二位大文豪像高爾基這樣具有廣博而複雜的下層社會的生活經驗，也沒有第二位大文豪能够像高爾基這樣親切地了解下層民衆的生活痛苦和要求，更沒有第二位大文豪像高爾基那樣親身受過各種各樣大小老板們的壓迫和剝削。然而這一切的生活上的壓迫，並不能使得高爾基屈伏。這使得高爾基認清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認清了社會上一切欺詐、貪污、人吃人的罪惡的病根是什麼，他把一生精力都貢獻給人類解放的大事業，直到他死，他是被人類的公敵，托洛茨基的黨徒們陰謀毒死的。

爲了追求真理，宣揚真理，高爾基受過無數次的害迫。幼年時代，他做人家的雇工或學徒的時候，常常因爲在夜裏偷偷地讀書而挨到打罵。後來，他在喀山的時候，認識了許多大學生和幹着祕密工作的革命的知識青年，因此就受到沙皇政府的特務人員的注意，經常有人釘他的梢。一八八九年他第一次被捕，那時他只是一個『形跡可疑的流浪漢』，他還沒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一八九八年第二次被捕，則已經是出版了第一冊集子的革命的作家了。從這以後，直到十月革命成功，高爾基又曾經兩次被捕，一次放逐。其間他又屢次患病。他的大部分的作品就是在這

樣困苦顛沛的環境中寫下來的。

高爾基在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中給我們看兩個世界的兩種人。一種是舊世界注定了要淪落的人，——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吏，一錢如命貪得無厭的商人，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知識份子，醉生夢死的寄生蟲，等等；又一種便是新世界的自己能够主宰自己命運的人——這就是從人民大眾的隊伍裏出生的，而且是在鬥爭中鍛鍊得十分堅強的自由解放的戰士，他們是不妥協的，自我犧牲的，永不灰心失望，也不會無條件的樂觀，他們是新時代的先驅，是新社會的創造者。高爾基指示給我們：那些舊社會的渣滓儘管今天還氣焰逼人，可是他們注定了要沒落的，他們的命運不會久長；而新社會的創造者，儘管今天還處於劣勢，然而終究會得到勝利，未來的歷史屬於他們。通過了藝術的形象，高爾基這樣教育了人民大眾。

青年的中國的新文藝，從高爾基那裏得到許多寶貴的指導。『五四』以來，我們的新文藝工作者在實踐中會遇到好些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可以在高爾基的作品中找到解答。『五四』以來，中國新文藝的道路是現實主義的道路，構成中國現實主義文藝的因素不只一個，俄國文學的優秀的傳統以及歐洲古典文學的影響，都是應當算進去的；但是高爾基的影響無疑地應當視為最直接的而且最大。『五四』以來，曾經有好多位外國大作家成爲我們注意的對象，但是經過三十年之

久，唯有高爾基到今天依然是新文藝工作者最高的典範，而且以後也會仍然是；單就這一點來看，也可以知道高爾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思想家和中國新文藝的關係是如何密切了。

現在中國人民正處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個關頭。中國將前進呢，抑是倒退？向民主的光明大道呢，還是停留在專制獨裁的深淵？和平建設呢，還是內戰破壞以至於總崩潰？全中國的人民正爲了爭取民主、和平、建設而奮鬥。中國的新文藝工作者在這偉大的鬥爭中是認清了自身的使命，堅定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的，而要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我們應當向高爾基學習者，多得很呢！但自然，一些反蘇份子不是這樣想的，他們寧願做戈爾的徒弟。這是他們的『自由』。不過，每一個真正愛護自己民族的中國人一定確信中蘇兩大民族的友誼是對於中國有益的，而中蘇文化的交流，也是對於中國文化有益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學習高爾基的創作方法，憎惡黑暗讚頌光明的精神，也是對於中國新文藝的發展有益的。

三十四年前，高爾基寫給孫中山先生的一封信裏曾經說：『我，俄國人，正和你一樣，都爲了那些理想的勝利而鬥爭……我們要盡一切的努力，去打擊我們的敵人，這些敵人準備熄滅日光，以便更順利地去做他們黑暗食林的事業』。今天我們紀念這位偉大藝術家思想家的逝世十週紀念，讓我們再讀讀這幾句話罷！這幾句話將是中蘇兩民族的文藝工作者攜手前進的旗幟！

高爾基與現實主義

高爾基年青的時候，曾經想進帝俄時代有名的卡桑大學讀書；他把投考卡桑大學必須預備的功課也都下過一番工夫，他沿路做工自給，到了卡桑，可是他沒有學費，終於被拒於大學的門外。於是他只好在下桑找工作，他經歷過多種的職業，其間也有失業的時候，乞丐街頭，餓肚子，與流浪人爲伍，他接觸了社會上各色人等，他的朋友，有工人，有店員，有窮苦的大學生，也有潦倒的自由職業者。後來高爾基寫他這一時期的自傳時，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這麼着，我就進了大學。」

青年的高爾基所進的「大學」就是那廣闊複雜，充滿了聲響色彩，提示了人生各種問題的舊俄羅斯社會！

青年高爾基在這樣一個「大學」中，看見了不少他所不解的人生現象，要求他嚴肅地思索，面對了不少困難複雜的人生問題，要求他分析判斷而應付，他體驗了不少光怪陸離的「人間味」，接觸着當時俄羅斯國土上交流橫溢的各派思潮，——所有這一切的「活功課」，都使得青年的

高爾基胸襟開拓，動心忍性，而爲此後的思想家藝術家的高爾基之偉大事業樹立了基礎。

高爾基在自傳中告訴我們，他那時也自己學習，讀了不少的書。他承認這些書給了他不少益處，給了他不少幫助。但是我們要認清了一點，高爾基那時不是爲了應付考試而讀書，不是在教師指定範圍內「爲讀書而讀書」，高爾基那時是爲了要了解他所不能解的人生現象而讀書，爲了要分析批判應付那些放在他身上來的困難複雜的人生問題，所以要讀書。他是爲要更能理解這世界這人生，所以要把頭腦武裝起來。因此，他不是讀死書，他不是「爲讀書而讀書」，他爲求解決問題而讀書，爲使自己成爲更完全的人而讀書！

我們更需認清一點，即高爾基那時還沒有想做一個文藝作家的念頭。他的力求認識理解這世界和人生，只因他是生活在這世界，他是人生這大海中的一滴，他要生存，要前進，便不能不澈底認識這世界和人生；他不是爲了要成爲一個文藝作家，所以才發心去認識和理解這世界與人生，正如他在更年青的時候就喜歡讀普希金的著作，喜歡讀大仲馬巴爾札克等人的作品也不是爲了想做文藝作家所以「要向古典作品學習」。他之喜歡讀普希金等古典作品，還是因爲此中充滿了人類的智慧，還是因爲他可以由此而擴大其人生的視野，豐富其生活經歷的範圍，而最後目的仍是爲了要澈底認識，並理解這世界與人生！

正因爲他不爲其他目的，而爲生活本身——爲了求得生活的更好更進步，爲了求得人類的更合理更幸福的羣居生活，爲了更能發揮人性中之善良的與美麗的而消滅其卑劣的與殘酷凶暴的——所以他更明白地看出這世界與人生的缺憾，及其所以致此的根本原因，正因爲他是從切身的關係去求認識並了解這世界與人生，而且是從力求生活得更合理更幸福的立場上澈底認識了這世界與人生的一切複雜錯綜矛盾的，所以當他拿起了文藝這武器向不合理與醜惡的現實挑戰的時候，就能這樣深刻而有力，像陰霾裏的雷電，震醒了蟄在地下的力量，宣告黑暗的死刑，鼓舞着光明勢力前進！

從這里，我們也就看出高爾基的現實主義和以前的文藝上的現實主義有「深」與「淺」之差，有「動的」與「靜的」之分。

從這里，我們又可以看出，凡有把現實主義與作家對這世界與人生所取的一定的態度（人生觀）相對立起來，而且以爲後者會妨礙了前者——這樣的主張是庸俗而錯誤的。

高爾基這一段歷史，給予我們從事文藝工作的人，以不少的啓示。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議論：爲什麼先要了解人類社會進化的法則呢？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是極其迂迴曲折的，從來沒有直線的發展。人類社會的活動（人生）又是充滿了伏流，暗流，逆流

，多種多樣，變化萬狀，矛盾百出，從來沒有單純的。一個社會科學家熟讀了人類社會進化的法則，固然可以有助於對社會現象之分析與判斷，因為社會科學家的任務在於尋求錯綜矛盾的社會現象之底蘊，加以原則化而指出其動向。至於文藝作家則不同。文藝作家的任務則在於將那些代表了動向而且具有典型性的社會現象，依其原來的錯綜矛盾的狀態，而加以形象化。因此文藝作家而如果像社會科學家那樣去思索，其結果必使他的作品成爲一篇文藝化的社會科學論文。文藝作家而如果讓他的情緒，感覺思索，都被社會科學的法則所束縛，則就會減低了他對於迂迴曲折的社會進化過程以及多種多樣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的感覺，就會損傷了他的「形象思索」。

這樣的議論，不能不說他「客觀」，然而可惜太「客觀」了，所以仍舊未能中肯。

爲什麼說牠「太客觀」了呢？因爲思索的過程，觀察的過程，事實上都不會那樣機械。事實上，沒有一個思想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會拈取一個公式作爲圈子，到社會現象的大雜院中拾取所需要的東西，一個文藝作家如果這樣辦了，那他便是個公式主義者。大凡社會現象通過文藝作家的「心眼」而以作品形式再現了時，其間必經過作家主觀的淘汰與概括，而素材愈豐富則淘汰與概括的作用亦愈能發揮，其結果則所得愈精醇而完備，同時有特殊性與普遍性。所以「生活經驗豐富」一語，實爲第一要件。但是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而無理解力，猶掏錢滿手，而無繩子以穿

之，還是不能受用。社會科學的知識便是這麼一條繩子，但自然，淺嘗輒止的社會科學知識也不是一條可靠的繩子。

高爾基青年時代的修養過程便是上述論點的最好的具體說明。

而他的對於人生態度的忠實與熱情：——對於生活的認真，他的爲了人生的最高理想而求認識並理解這世界和人生的立場，便是他的現實主義所以能比過去文藝巨匠的現實主義更前進一步。

永遠年青的韜奮先生

初見韜奮先生總覺得他不過三十多歲，不但他容貌使你有此感覺，他的言談舉止都表示他絕對不是飽經憂患的五十左右的人了。和他相處稍久，你便會覺得估量他有三十多歲也還太多，實在他好像只有二十來歲。比現在有些二十多歲的年青人更爲「年青些」的一個中年以上的人。

有許多的二十來歲的年青人在言談舉止方面當然也有韜奮先生那種活潑和熱情，至於容貌不用說，自然會比不見老的韜奮先生更爲「後生」，然而，恐怕未必能有韜奮先生這樣的天真！對人的親切，熱情，對事的認真，踏實，想到任何應該辦的事便馬上想辦，既辦以後便用全付精神以求辦得快，辦得好，想到人世間一切的黑暗和罪惡便憤激得坐立不定，看到了卑劣無恥殘暴而又慣於說謊的小人，滿嘴漂亮話而心事不堪一問的偽善者，便覺得難與共戴一天——這些都是韜奮先生的永遠令人敬仰之處，然而，我以爲最可愛者仍是他那一點始終保持着的天真！

不計利害，不計成敗，只知是與非，正與邪，有這樣操守的人固不獨韜奮一人；然而像韜奮那樣一以天真出之，就我的寡陋的見聞而言，尙未見有第二人。對於畏首畏尾的朋友，他有時會

當面不客氣地批評，這是他的天真。辦一件事，有時會顯得過於操切，這也是他的天真。爲了忘記疲勞，會在噓頭主義的歌舞影片之前消磨數十分鐘而盡情大笑，這同樣也是他的天真！或者有人以爲這是他的盛德之玷，可是我覺得這正是他的可愛之處；我們現在太多了一些人情世故，得像一個「太平宰相」似的青年！

由此可以想像到：要他在一個惡濁的社會中裝聾作啞，會比要了他的生命還難過。他需要自由空氣，要痛快的笑，痛快的哭，痛快的做事，痛快的說話。他這樣做了，直到躺下，像馬革裹尸的戰士。雖然已經抱病，他奔赴他的崗位，貢獻了他的力量，以至於生命。

民族解放戰爭的陣營裏損失了一位偉大的戰士，文化界殞落了一顆巨星。韜奮先生是死了，然而這巨星殞落時的雷鳴似的震響將喚起千千萬萬人民的應聲，長虹似的閃光將燃起千千萬萬人民的熱血！無數的青年人將永遠把他當作自己的師友和長兄。

沒有親眼看見抗戰的最後勝利，沒有親眼看見民主的中國之長成，韜奮先生大概是死不瞑目的；然而我可斷定他在彌留之際，心中是充滿了信心的，比他向來所具的信心更爲堅強的信心。因爲他已經親眼看見了人民力量的成長，已經用他自己的心血和敵後堅持抗戰的無數萬軍民的血灌溉了民主政權的土壤！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憶洗星海先生

和洗星海先生見面的時候，已經是在聽過他的作品（抗戰以後的作品）的演奏，並且是讀過了他那萬餘言的自傳（？）以後。（這篇文章發表在延安出版的一個文藝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後寫的。）

那一次我所聽到「黃河大合唱」，據說還是小規模的，然而參加合唱人數已不~~不~~三百左右；朋友告訴我，曾經有過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揮是一位青年音樂家，（恕我記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魯藝音樂系的短短時期內訓練出來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訴我，要是洗星海自任指揮，這次的演奏當更精采些。但我得老實說，儘管「這是小規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揮，可是那一次的演奏還是十分美滿；——不，我應當承認，這開了我的眼界，這使我感動，老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裏抓，癢癢的又舒服又難受。對於音樂，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我不能有條有理告訴你：「黃河大合唱」的好處在那裏。可是牠那偉大的氣魄自然使人鄙吝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

從那時起，我便在想像：洗星海是怎樣一個人呢？我曾經想像他該是木刻家馬達（湊巧他也是廣東人）那樣一位魁梧奇偉，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們又告訴我：不是，洗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歡說笑，話匣子一開就會滔滔不絕的。

我見過馬達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執筆沉思，大的斗篷顯得他頭部特小，兩眼眯緊如一綫。這人就是洗星海，這幅木刻就名為「洗星海作曲圖」。木刻很小，當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寫真」，而在表達洗星海作曲時的神韻。我對於這一幅木刻也頗愛好，雖然牠還不能滿足我的「好奇」。而這，直到我讀了洗星海的自傳，這才得了部分的滿足。

從星海的生活經驗，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氣魄。做過飯店堂倌，咖啡館雜役，做過輪船上的鍋爐間的火伙，浴室的打雜，也做過乞丐，——不，什麼都做過的一個人，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壓倒，雖有抱負只成爲一場夢，又一是一是戰勝了生活，那他的抱負不但能實現，而且必將放出萬丈光芒。「星海就是後一種人！」——我當時這樣想，彷彿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約三個月以後，在西安，洗星海突然來訪我。

那時我正在候車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幾個月，即將經過新疆而赴蘇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自己通了姓名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呀，這就是洗星海麼！」我心裏這樣說，覺得很熟識，而也感得生疎。和友人初次見面，我總是拙于言詞，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而在那時，我又忙于將這坐在我對面的人和馬達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較，也和我讀了他的自傳以後在想像中描繪出來的人作比較，我差不多連應有的寒暄也忘記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絕說起來了。他說他剛出來，就知道我進去了，而在我還沒到西安的時候就知道我要來了；他說起了他到蘇聯去的計劃，問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講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我對於音樂的常識太差，靜聆他的議論，（這是一邊講述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計劃，一邊又批評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將來致力的方向），實在不能贊一詞。豈但不能贊一詞而已，他的話我記也記不全呢。可是，他那種氣魄，却又一次使我興奮鼓舞，和上回聽到「黃河大合唱」一樣。拿破侖說他的字典上沒有「難」這一字，我以為洗星海的字典上也沒有這一個字。他說，他以後的十年中將以全力完成他這創作計劃；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因為他不但有堅強的意志和偉大的魄力，並且因為他又是那樣好學深思，勇于經驗生活的各種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謠的材料。他說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帶給

他的一包陝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覺得還很不够，還有一部份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處去了。他說他將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載，儘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謠，然後再去蘇聯。

現在我還記得的，是他這未來的「民族交響樂」的一部份的計劃。他將從海陸空三方面來描寫我們祖國山河的美麗，雄偉與博大。他將以「獅子舞」，「划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間的娛樂，作爲他這偉大創作的此一部份的「象徵」或「韻調」。（我記不清他當時用了怎樣的字眼，我恐怕這兩個字眼都被用錯了。當時他大概這樣描寫給我聽：首先，是讚美祖國河山的壯麗，雄偉，然後，獅子舞來了，開始是和平歡樂的人民的娛樂，——這裏要用民間「獅子舞」的音樂，隨後是獅子吼，祖國的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將從「獅子舞」，「划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族形式的民間娛樂，來描寫祖國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預備在旅居蘇聯的時候寫你這作品麼？」我這麼問他。「不！」他回答，「我去蘇聯是學習，吸收他們的好東西。要寫，還得回中國來。」

那天我們的長談，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誰又料得到這就是最後一次呵！「要寫，還得回中國來！」這句話，今天還在我耳邊響，誰又料得到他不能回來了！

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在寫這小文的時候還覺得我是在做惡夢。

我看到報上的消息時，我半晌說不出話。

這樣一個人，怎麼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這樣想：我在國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萬里，且經受了生活的極端的困厄，而同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大概還覺得這一段「儻來」的不平凡的生活經驗又將使他的創作增加了瑰麗的色采和聲調；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樂道這一番的遭遇，覺得何幸而有此罷？

現在我還是這樣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開頭他就會講述這一段 沛流離的生活，而且要說，「我經過中亞細亞，步行過萬里，我看見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許多題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時間永遠不能磨滅我們在西安的一席長談給我的印象。

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具有偉大氣魄，抱有崇高理想的洗星海，永遠坐在我對面，直到我眼不能見，耳不能聽，只要我神智還沒昏迷，他永遠活着。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

後記

此集所收凡二十餘篇，除「風景談」而外，都是香港戰後回到「大後方」的兩年半內所寫的。其中有雜文，有追悼懷念之文，也有仍然不免是「賦得××」的應時紀念文。雜文之類，也許還不止此集所收這一點，但既無底稿，一時也想不起來會發表于何處，反正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就此撩開完事。

這兩年半的時期中，全世界發生了空前的大變動。納粹德國崩潰了，從斯大林城開始反攻的蘇維埃紅軍于兩年之內愈戰愈強終於勝利地佔領了柏林；法西斯意大利也完蛋了，墨沙里尼受意大利人民的審判，明正典刑；被奴役的歐洲國家的人民翻了身了，到處叫出了解放的呼聲。世界的民主潮流是這樣的洶湧澎湃，然而看看我們自己這國家，却那麼不爭氣。貪官污吏，多如夏日之蠅，文化掮客，幫閒篋片，囂囂然如秋夜之蚊，人民的呼聲，悶在甕底，微弱到不可得聞。在此時期，應當寫的實在太多，而被准許寫的又少得可憐，無可寫而又不得不寫，待要閉口歌頌罷，良心不許，擱筆裝死罷，良心又不安：于是而凡能幸見于刊物者，大抵半通不通

，似可懂又若不可懂；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最近有一封信述及美國讀者對於中國現代文學之好尚，謂「雜文」之類，美國人最不感興趣，因其似懂非懂。嗚呼，豈但美國人；我們中國人亦只能從字縫中猜猜而已！中國的作者多少年來是不得不在夾縫中寫字的，中國的讀者多少年來是不得不從字縫中猜度的，民主作風的美國人如何會懂得我們的特別國情？

諸如此類的話，反正說不完，姑且打住。我寫這後記，用意不在借此喊冤，我的用意只在申明這一些小文章本身倒真是這「大時代」的諷刺。沉默是偉大的諷刺，但「無物」也可以成爲諷刺。這些小文章倘還有點意義的話，則最大即在於此。命名曰「時間的紀錄」者，無非說，從一九四三——四五年——這震盪世界的人民的世紀中，古老中國的大後方，一個在「良心上有所不許」又有「不安」的作家所能紀錄者，亦惟此而已，而抱有此感者，度亦不盡作者個人，千百同仁，心同此理。因此寫了出來，以示同道，以求共鳴。一九四五年七月，中央社補發周炳琳答詞之日，記于唐家沱。茅盾。



後記之後記

「時間的紀錄」剛剛排印好，日本人就投降了。爲了「受降」，本來不健全的交通運輸那時是加倍困難了。本書出版後因此就擱淺在出版家的棧房中，不久以後，又遭回祿，據出版家給我的報告，本書除已售出六百餘冊，存書及紙板全部焚燬。半年來頗有讀者問起這彷彿曇花一現的小書，於是敝帚自珍的心情亦油然而生，現在商得原出版家（良友圖書公司）的同意，收回版權，轉以歸入「大同文學叢書」。初版頗多誤植，茲爲一一訂正，並增加「森林中的紳士」，「現在要開始檢討」，「爲詩人們打氣」，「最理想的人性」，「高爾基和中國文學」，「高爾基與現實主義」，「憶沈星海先生」等七篇。又初版有「不可補救的損失」及「悼念胡愈之先生」兩篇，是訛傳愈之不幸時寫的，現在既知愈之兄幸慶健在，自當刪去。初版又有「不能忘記的一面之識」及「馬達的故事」則因體裁與本書其他各篇有殊，茲亦從略。一九四六年七月，歐洲和會開幕之日，記于上海、茅盾。

編 輯 委 員 會

洪 深
葉 聖 陶
郭 沫 若
鄭 振 鐸
茅 盾

時 間 的 紀 錄

著 者 茅 盾

發 行 者 蔣 壽 同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上 海 中 正 東 路
地 書 屋
一 四 五 四 號 四 二 一 號 室

封
底